



抗議人大常委會否決二零一二雙普選！權力歸於人民！

施政報告拖延政改，劫貧濟富！

區議會選舉評析

立法會補選的對決

中共十七大及其報告透視

民怨民憤 遍地浮現

古巴專頁

悼念劉平梅同志 (1920-2007)

抗議人大常委會否決二零一二雙普選！

權力歸於人民！

仲明

2007年12月29日上午，在北京舉行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1次會議，就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作出了決定：2012年不能有任何的普選！

回歸祖國十年了，香港市民仍然未能普選特首！

回歸祖國十年了，香港市民仍然未能普選立法會全體議員！

這是繼05年人大釋法否決07及08普選之後，再一次顯露中共官僚獨裁統治的醜陋面目的可悲時刻。

官僚專政下的產物

香港祇是一個位處南陲的城市。人口才不過六百多萬，教育的普及程度遠高於中國內地，雖然未必處於世界最先進的行列，但總的來說，必定位居亞洲的前列。新聞、言論等自由也比國內強得多。完全有充足的條件實施民主制度的最起碼操作性程式：就是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權。

但，正正由於基本法施加的桎梏，令致香港今天仍未能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一個向市民直接負責的政府。

可悲的是，回歸祖國十年了。香港市民引頸以待的選舉權和被選權，仍然被本地和北京的權

貴，以諸多藉口加以限制、剝奪。香港市民不單未能普選特首，就連立法會的六十個議席也未能全部直選產生。這種情況完全與香港市民的想法不符，或者，至少是與大多數市民的願望背道而馳的。

在過去多個月的諮詢期和所謂「決策」的過程中，香港市民的意見的確是發了聲，一定程度上被人記錄在案。但是，到最後的關頭，人們見到的，不是人民的意願獲得尊重、市民大眾的意見得到真正的重視。

人們見到的是，一個外在的，所謂「人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一個連民選產生也談不上的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在香港市民的頭上指指點點，就這樣地，從上而下地，頒令一項家長式的政令，強行剝奪全港近七百萬人原本就應有的政治權利。這是那號子的民主程序？

這正是最赤裸裸的制度性的暴力。一種由當權的統治者，利用手上掌握的政權機關，運用其握有的公權力，把群眾不放在眼內，並且高高在上發施號令，指揮天下，令人民屈服在其絕對權力的淫威之下。這種制度性的暴力，可以得逞於一時，但最終必會引來人民群眾的反抗。

假基本法之名行獨裁專政的惡行

中共官僚的墮落之處，在於他們爲了維護其腐敗的統治，不惜一切，死抱其權力不放。其根本就不是在維護工人、農民及社會上最弱勢的社群的利益。長久以來，中共官僚要維護的，已是

有產者的利益、以及官僚階層的利益。祇是，到了今天他們就連香港也是如此而已。

從他們說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時，可以清楚看到他們的嘴臉。他們一方面一槌定音，繼 05 年否決 07、08 年普選之後，再一次把 2012 年雙普選否決。

喬曉陽、張曉明、李飛以至譚慧珠、黃宜弘和譚耀宗等人用上的，就是這樣的態勢。

首先，喬曉陽說，基本法的原意，是要在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過了一半之後，才會考慮普選問題。這個說法，完全暴露了中共官僚的野蠻本質。爲了達致維護其貪污腐敗的政權，便將人民的權利肆意踐踏。而且還公然宣之於口，胡說甚麼立法原意來剝奪人民選舉、監察和罷免政府的權利。他這種砌詞說起來還蠻有道理之貌。這充份說明，中共官僚病入膏肓的獨裁統治，根本上已成爲人民的公敵，絕對沾污社會主義的名聲。

喬曉陽跟著又說，功能組別在香港政制各界均衡參與起著「積極作用」。張曉明更指出，功能組別貢獻了本地生產總值的九成，可謂「功不可沒」，與普選沒有必然矛盾，故不可能簡單將功能組別「在普選方案中完全排除出去」。

凡此種種，都在在說明，中共一直在透過「解釋基本法」來柑制香港的民主發展進程，這是一種肆意行使其官僚統治的伎倆。

事實上，小圈子選舉特別行政區的特首和功能團體的不民主選舉方式，早就受有識的市民所唾棄。惟獨是社會上的當權既得利益者和有產階級，才不斷死抱著這些違反民主原則的政治免費午餐死命不放。而中共自身在國內固然向資本屈服，連資本家也可以皇然入黨。因此之故，內政

延伸到香港，也必然地體現這種向有產階級傾斜的政策。

問題是香港的普羅大眾應該接受這樣的安排嗎？

爭取怎樣的民主

香港過去十年的重重波折，如七年的「建華之亂」，正是源自基本法有關政治制度的規定的惡果。六百多萬市民深受其苦，多少人因著這樣的時勢而死於天災人禍。凡此種種，市民在過去已莫內他何。

時至今天，市民還是要袖手旁觀下去嗎？十年又再十年。連最起碼的民主權利也被人粗暴地柑制，這種情況還說得過去嗎？

甚麼「循序漸進」、甚麼「和諧社會」的說法，統統是騙人的鬼話。

明明白白是要香港市民臣服於國內官僚制度那一套高高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方式！

明明白白是要那些無權無勢的香港市民臣服於那些既得利益者無孔不入的層層盤剝！

一句話，就是要眼睜睜地看著官商繼續勾結，無論是在香港或在內地！

這樣一個祇爲有產者著想的政府、這樣一項祇對有產者有利的政策，人民爲甚麼要順從呢？爲甚麼不可以倡議不合作運動呢？！

權力歸於人民！

人民有選舉、監察和罷免政府的權利！

立即實行全面普選向人民負責的政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施政報告拖延政改，劫貧濟富！

軍行

香港經濟近幾年有良好發展，港府財政盈餘大增，即在本財政年度也會有 1000 億元以上盈餘。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指出：目前港府財政儲備逾 3700 億元，外匯基金滾存累計盈餘 5900 億元，合共近一萬億元。低下階層市民在「同甘共苦」、「共渡時艱」多年之後，雖然又受到通貨膨脹、物價樓價飆升之苦，仍然盼望能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可是，曾特首在連任後發表的施政報告，對低下階層市民的實際援助卻極之少，沒有提出切實有效政策去解決香港長期面對的問題，包括在職貧窮、長者退休及醫療保障等問題，或者是只採取避重就輕的對策。

報告主要是發給長者每年 250 元的醫療券，用作看私家醫生等，以變相節省公共醫療負擔。它提出的幾種扶助長者措施，據《明報》統計共約 8 億元。但對於大多數長者用來幫補生計的生果金，9 年未有增加過，而生活開支今天卻已漲了很多；社會上普遍的聲音都要求增加長者生果金和綜援金等，以幫助舒緩弱勢社群的困苦。然而，報告對此卻不予理會！

反之，對於大企業、大財團及其高薪負責人，卻非常慷慨，它（他）們長期來大大得益於港府政策的有力幫助，例如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的推行，已從中賺取了難以統計的巨額財富，他們中許多人都擠身於全亞洲以至全球的富豪榜排名前列，就可得到證明。

我們從香港回歸以來，都評價港府從董建華特首開始，實質上是官商勾結的富人治港。今天的《報告》再一次表明港府對大資產者利益的繼續維護，它提出削減薪俸稅及利得稅 1%，從而使庫房少收 50 億元，主要的得益者是大財團、大資本家。這比之扶助長者的總金額高出 5 倍多，又一次充份證明港府的欺貧敬富！

照理，對於經營獲利越豐和收入越高的企業和個人，都應該徵收累進稅，而不是現時那樣一律收取 15%，表面上「一視同仁」，實際上明益富人，亦即是從大多數低下層市民理應得到的經濟成果中搾取給大企業和富人，等於俗語所說的「劫貧濟富」。

而對於政制發展問題，長長的報告中只用了短短的 3 段，重申它梳理和總結收集到的『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意見，會「如實」向中央反映，並在這 5 年任期內為普選凝聚共識，解決（有時又說「處理」）普選問題。

但在兩天後的電台節目中，特首談及民主發展與管治效率的問題時，主動拿文革作比喻，指當民主發展走到「極端」，便會出現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民掌握一切，（政府）無法管治」的情況。他的「民主文革論」引起各界嘩然，有學者直斥特首引喻失義，將文革的因果「本末倒置」；有議員更譏諷特首不懂中國歷史，「將獨裁講成民主，要上一堂國民教育課！」

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絲毫沒有民主的成份，只是毛澤東利用這個美麗幌子去肅清黨內外的不同意見者以至國家領導人，加強他個人的獨裁地位，同時發動狂暴的青少年組成紅衛兵，作為他的工具，從而造成十年的浩劫。曾特首忽然間透露出他內心對民主的不了解和惡感，立即引起普遍的不良反應，而在強大的反對壓力下，縱使他在次日被逼作出聲明，說要收回昨天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但古語有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內心對民主的偏見已表白於市民面前，有如潑在地面的水難以收回一樣。由此可以想到，希冀他能真誠地幫助儘快實現雙普選，而不會是敷衍塞責，那未免是太天真的奢望；雙普選的實現，祇能靠市民的齊心協力爭取到。

2007 年 11 月 12 日

區議會選舉評析

振言

這次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約 38%，較 2003 年的 44.06%，雖然少了約 6 個百分點，但是投票人數多達 114 萬，較 03 年多了約 6 萬，在缺少類如「七一效應」等特定事故驅動下，區議會的投票人數仍然有所增長，一般地顯示市民對於政治的關心和參與更趨穩定，在推動本港民主進程方面，這種表現是值得肯定的。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時的政治經濟大氣候，與 2003 年的選舉時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大大影響了選舉的結果。

當時，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囂張猖狂地強銷 23 條，保皇黨民建聯全力支撐她，加上民生困苦多，市民怨憤大，因而激發了 50 萬市民上街抗議，導致民建聯在後來的區議會選舉中慘敗，民主黨派大勝。

今年，香港的經濟情勢繼續好轉，也無官員要提出制定第 23 條，許多港人對政府的怨憤略為減少，隨之對親政府的政黨也減少了反感。

民建聯在這次選舉中席位大增，與 03 年的減少恰恰相反，它派出 177 名候選人參選，奪得 115 席，比上屆多了 53 席，成為區議會中最大的政黨。這不但由於他們利用了現時的大氣候，而且由於他們在這 4 年內汲取了 03 年慘敗的教訓，痛定思痛，決心發奮圖強，全力加強地區的工作，爭取市民的好感和支持，特別是得到國內當局的實際幫助，富人(尤其是由港到內地設廠經商的資本家)的經濟贊

助，發展了大量黨員，成為「萬人黨」，變成名符其實的財雄勢大保皇黨。

它有充足的經濟條件能僱請大量工作人員去做地區工作，大辦福利醫療服務，和蛇宴、海鮮宴、荔枝團、旅遊及贈送禮物等，從而贏取了許多街坊的好感和支持。

而且，他們有長期的工作經驗，學得了共產黨的豐富群眾工作的傳統，本身有嚴密的組織佈署，妥善的工作安排，又有強大的動員力。這些也是民建聯競選的極有利條件。

該黨是建制派，保皇黨；政府的「親疏有別」政策，又或明或暗地予以幫助，「明」的有如，民建聯的鍾港武競選橫額，大幅刊出他與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民建聯領導人曾鈺成的親兄弟)的合照，圖中更大字介紹後者的姓名及其官職身份；有人提出質疑，選舉事務處卻表示「不評論個別事件」而不理；但民協候選人吳寶珊的海報有民政事務專員的照片，民政專員卻要吳將照片遮蓋，顯然是雙重標準，偏幫民建聯。(見 11 月 10 日《蘋果日報》)

在公開競選宣傳期間，香港有幾份報章都公然大捧民建聯的候選人，盡量貶低泛民主派候選人，有白紙黑字的大量事實為證。

另外，據《明報》24 日報導：香港大學傳媒研究中心等分析區議會選舉中的各區政治版圖，結果發現，在一些地區中，居港 7 至 10 年的新移民人口增加了數千至 1 萬人，如

元朗，觀塘，葵青，深水埗和離島，泛民主派在有關地區優勢顯著下降，親建制派於上述地區的直選議席則大幅增加，例如，元朗區親建制派較上屆多取 6 席，泛民主派則失去 4 席。（這部份是前者得助於特別幫助新移民解決困難的結果。）

沒有民建聯上述的許多優越條件而參選的泛民主派和政治團體，其得票就相對地少很多。它們的參選和當選人數，分別是，民主黨 108 人中有 59 人當選，民協 37 人中有 17 人，公民黨 42 人中有 8 人，社民連 30 人中有 6 人，前線 16 人中有 6 人，街工 5 人中有 4 人，職工盟 4 人中有 2 人，等等。除這些之外，自由黨 56 人參選則有 14 人當選……。

今次的參選人中，有非常多的獨立候選人，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報章所稱的「潛水獨立派」，或者是學者所說的「隱形左派」，他們可能由建制派所組織或推動，以獨立名義掩蓋其真正政治立場，分薄泛民主派的選票，有利於民建聯的大勝。

據港大分析指出，扣除自動當選及委任議員，親建制派、泛民主派和獨立人士在全港取得的區選議席，有「三分天下」之勢，分別擁有 29%、30% 及 38% 的總議席。

不過，從區議會全體成員來看，如果真正獨立的區議員與泛民主派區議員站在一起投意見相同的票，恐怕仍難以超過民建聯聯合其餘非真正獨立的、和親建制派區議員的票數，全港絕大部份地區的區議會都將會由民建聯操著「話事權」。

選舉後，許多評論員都對泛民主派的挫敗歸因於它們過去 4 年來少做地區工作。其實這並非主要的原因。比如以民協來說，他們 20 年間是很著重地區工作的，結果，仍比上次贏得的 25 席減少了 8 席。由此可見「大氣候」和資源對競選所起的重大作用。

再以本社同人陳昌來說，他在平田選區默默耕耘了 20 多年，在該選區當選過 5 屆區議員，這次以社民連成員名義競選連任，結果被上次選舉中落敗的對手所戰勝，這主要也是大氣候所促成的。

同樣出於大氣候轉變這個主要原因，03 年 50 萬人大遊行的組織者（《明報》稱之為「七一搞手」）的民陣發言人、現為「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發言人和「民主動力」召集人的蔡耀昌，以及代表社福界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公民黨譚香文，也在選舉中落敗。

不過，古語有云：勝敗乃兵家常事，不以成敗論英雄。落選後的有志人士，仍需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繼續努力於地區工作，服務街坊，縱然缺少了區議員所得到的工作上便利和財力津貼幫助。而這樣做也會有助於下屆區議會選舉時捲土重來，東山再起，如果還要參選的話。

港府歷屆都委派出百多名委任區議員，完全違反民主選舉產生的公平原則；對此，全港市民必須齊心反對，而要求立即取消委任制。同時要提出擴大區議會的實際職權，以加強落實區議員的責任和功能，這些目標是必需努力爭取實現的。

2007 年 11 月 25 日

立法會補選的對決

微波

為填補民建聯主席馬力逝世遺缺的立法會補選，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之後 14 日舉行。補選的選民總數是 618 350 人，投票人數是 321 938 人，投票率是 52.06%。在 8 位參選人中，兩位前港府高官陳方安生和葉劉淑儀成為熱門人物，佔了兩月來競選宣傳和傳媒報道的焦點。選舉結果，陳太取得 175 874 票，得票率為 54.63%，葉太取得 137 550 票，得票率為 42.73%，比陳太少 38 324 票，其餘 6 人得票很少。短期內兩次選舉的結果對兩大陣營完全不同，泛民主派支持的陳方安生，並不因泛民主派在區選中大敗而跟著敗選。

本來，民建聯在區選大勝翌日，曾聲言會發動其 18 區支部力量協助葉太競選，意味著會以其龐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去支持她，而在港島街頭，也到處見到她的旗海飄揚，宣傳品經由大量的助選人員廣泛散發，聲勢浩大。

至於陳太方面，則人財物各種條件都遠比不上對方，但結果仍打敗了葉太，這是有多種因素造成的：陳太的政綱著重于爭取民主，爭取 2012 年實行雙普選，以此得到很多熱愛民主的選民支持，她的品格和形象頗受港人歡迎，在選前的競選論壇上表現較對手為佳，許多民調結果顯示她都佔優勢，反映出她頗得民心。

在競選期間，愛國報章贊揚葉太，貶低陳太，而以「陳老太」稱呼她，似乎要暗示她 67 歲高齡已老不中用了。

徐家傑突然提出 14 年前陳太買樓

十足按揭的舊事來指責陳太以權謀私；但這類事原本應向廉政公署投訴，加以調查處理的。據報章報道，徐家傑當年因涉嫌與國安人員過從密而被陳太建議撤去其廉政公署副執行處長一職。徐最新表態是支持葉太，反映他對陳太有個人恩怨，其親建制派立場也充分表露。但這一舊事重提，給不少市民視為有意抹黑陳太，反而增加了對陳太的同情票。而且，據說在選舉前夕「左派」突然發動短訊攻勢給手機用戶，發放抹黑陳太的信息，激發了一些選民出來投陳太票，葉太在選後公開承認此舉反而對她幫倒忙。

葉太在競選中落敗，重要原因是廣大市民沒有忘記她在 2003 年強硬囂張地推銷第 23 條惡法的劣跡。她在補選論壇上受到別人提問此事時，還要沉不住氣，立時變臉，顯示她並沒有真心承認當年的錯誤。她在選後還不認輸，而宣稱她已拿到 42% 的選票，陳太則僅有 54% 選票，已打破了泛民與建制派得票的「六四定律」；他更加說「泛民主派請到最高級官員陳太出來，應該以七三（得票比例）擊敗我……我覺得自己已經是贏了！」，這彷彿是說，陳太已敗在她手下。這是魯迅所說的「阿 Q 精神」，是陳太所回應的「跌倒地抓回一些沙」，自我安慰。但也顯示她的不服氣，而愛國報紙也讚她「雖敗猶榮」。

陳太在選後的答謝詞中指稱：「這次勝利不是屬於我個人，而是屬於所有熱愛民主的香港人。」「這是大家爭取雙普選的強心針。」的確，如果沒有那麼

多選民出來投票，達到 52% 的投票率，那很可能給葉太的建制派鐵票所戰敗，而對於港人爭取民主的熱望則是繼區選挫敗後的又一個打擊，可能影響一些人的信心。經此一勝利，對於明年立法會選舉，對於爭取 2012 年雙普選，都會有積極的激勵推進作用。港人，尤其是泛民主派人士，都需要從這兩次選戰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爭取實現雙普選和民主發展再接再厲，繼續努力！而這次補選也証明港人行使普選權利的成熟。

不錯，走向民主的路是漫長而艱苦的。在陳太出席第一次的立法會會議上，就遭受到港府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的攻擊。她在會上參與辯論社會企業時的發言，有「剛才湯家驊議員提及，民主和民生是不能分割，沒民主就沒公義，弱勢社群亦得不到照顧」之語。民政局長曾德成在回應議員發言時，不點名地批評陳方安生，說：「她既然說，沒民主就沒民生。記得她曾經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主持過經濟和福利方面的

工作，除非她認為殖民統治就是民主，否則我不知道她當時所做的，到底是否民生的工作，還是官生的工作，或者不叫安生，是官生才對。她說在競選期間，知道了民間疾苦。原來除了忽然民主之外，還會有忽然民生的。」

(引自 11 月 6 日『明報』) 他以民政事務局長身份出席而發表這樣的言論，立即遭到強烈的反應。

有人替曾德成解圍，說他是忽然爆肚的，譚耀宗則辯稱是因「有感而發」；但電視螢幕上卻現出他是看著講稿發言的。

這樣嚴厲的指責，充份顯示出他所支持的親京「左派」對陳太獲勝很不甘心，連帶也對投陳太票的 17 多萬選民的不滿，從而造成對這些選民的侮辱。幸而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對於高官的侮辱，祇會增加反感，因而在明年的選舉中會更堅定地投票支持泛民主派的候選人。對於這，且讓事實的証驗吧！

2007 年 12 月 6 日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 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 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 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 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 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 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 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 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 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 元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 34 卷第 2/3 期(總第 223 期)

2007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電話：9846 3428 傳真：3494 1762

Address：GPO Box 10144, Hong Kong

Tel: (852) 9846 3428 Fax: (852) 3494 1762

E-mail：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中共十七大及其報告透視

張開

中共 17 大通過了胡錦濤所作的報告,這個報告洋洋近 3 萬言,堆滿著非常美麗的詞句,但大量詞句如非陳腔濫調,便是言不符實,或是與實際相差很遠。會議把報告所強調的科學發展觀寫進了黨章,並選出了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其常委,胡錦濤連任中共總書記和軍委會主席。「科學發展觀」這個主張,代表著胡錦濤的「理論」貢獻,要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相提並論,並駕齊驅。

美麗的願景和困難

《報告》強調指稱:「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內在統一的,沒有科學發展就沒有社會和諧,沒有社會和諧也難以實現科學發展。」

可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祇有在沒有階級存在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社會和諧。《報告》認為:「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實際上,中國今天連這個初級階段也遠未達到,反而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闡明:社會主義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中國今天還不能實現這個目標。而《報告》也說,中國現時的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改革攻堅面臨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統籌兼顧各

方面利益難度加大;農業基礎薄弱、農村發展滯後的局面尚未改變,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任務艱巨。

上引的許多敘述都含糊抽象,半吞半吐。例如說,「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還有相當數量」,這個「相當數量」到底是以萬計還是以億計呢?這類人口是否能夠在未來 13 年之內真正進入到小康水平,同時農村發展滯後的局面能夠改變,現時面臨的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能夠大體上解決嗎?何況,這些矛盾和問題有許多是由於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帶來或加劇的,市場經濟今後越是發展,相關的矛盾和問題也會越大越多。

《報告》在列出中共自 16 大以來的工作成績之後,也說要清醒認識到,「前進中還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突出的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思想道德建設有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我們要高度重視這些問題,繼續認真加以解決。」

這些敘述照例又是輕描淡寫,欲語還休的。這一連串困難和問題長期存在,許多次人大會議工作報告都說要克服,要解決;可是,成效卻令人失望。現在又許諾要在 2020 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那是否承諾到那時已能解決(或大

體上解決)上述的困難和問題呢?如果還不能夠,那是否證明已經「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了呢?

《報告》訂定,到 2020 年實現人均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兩番。這也就是要實現人均生產總值約 2400 美元的目標。

2000 年中國人均生產總值約為 800 美元,遠低於中等發達國家的 2000 美元水平,副總理曾培炎強詞辯稱中國為低水平的小康,「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最後一句話實際上是誇大了的。

到 2020 年,《報告》要確保「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即是說,到時中國人民的「家庭經濟比較寬裕,可以安然度日。」(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對「小康」一詞的解釋)而前面的「總體」,亦即是指「全部,整體」。(同上『辭海』的解釋)且看屆時又是否指「低水平的小康」,類似於叫人民望梅止渴,畫餅充飢吧!

力推市場經濟的後果

《報告》雖然宣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全篇充滿了「社會主義」的形容詞,但實際上卻主張: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要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於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這就是說:要大力地全面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建立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制度。也因為這樣要發展市場經濟,便日益遠離社會主義的目標。它具體主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局面。」實際上,在私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競

爭下,越來越佔優勢的將會是私有制經濟,排擠、腐蝕和逐漸取代了國有制經濟。

廣東省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明顯例子。據 8 月 6 日《文匯報》載新華社廣州 5 日消息:「記者從廣東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獲悉,該省私營企業連年保持快速增長的發展態勢,至今年 6 月底,實有戶數又創新高達 58.05 萬戶,佔該省各類企業戶數三分之二的比重。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集體及其控股企業的改制和產業結構調整,廣東省國有集體及其控股企業戶數連續 9 年下降,而私營企業卻以較為迅猛的速度發展。」

廣東省是這樣,全中國的私企經濟發展態勢也大致上相類似。而在全國的公有制經濟方面,則繼續在縮減規模。

例如,據《上海證券報》11 月 3 日報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管委會主任李榮融昨日表示,將在未來 3 年內加快推進中央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目前的 155 家中央企業總數將縮減到 80 至 100 家。截至 2006 年底,中央企業的資產總額達 12.2 萬億元。(1)

隨著經濟實力的蓬勃增長,資本家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要相應提高。據最近一次調查中,28.8%的私營企業主認為「爭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最為迫切。(2)

17 大新聞發言人李東生 10 月 15 日也表示,現在很多年輕人,包括很多的私營企業主都積極要求入黨。

2006 年,全國共發展新的社會階層黨員 10773 名,其中發展私營企業主黨員 1554 名。李東生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包括我們通常說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

者等社會階層。

據介紹,截止到今年 6 月,全國中共黨員的總數是 7336 萬名,比 2002 年黨的十六大時增加了 642 萬名。全國現有黨的基層組織 360 萬個,比 2002 年黨的十六大時增加了 14 萬個。

《文匯報》獲得的消息顯示,中共十七大代表名單中,有一亮點一直備受各界高度關注:30 名從各地精選出來、據稱可以代言中國 10 萬億私企資產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代表,閃亮出現在中共執政黨最高層級黨代名單上。這些私營企業主出身的「兩新代表」,大多掌握巨資,有的身家達數十億元。(3)

後來,正如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先生以《大批「剝削者」在十七大成功上位》為題的文章所指出的:新選出來的黨中央委員會中,有 20 多名紅頂商人或已轉為高幹的前老闆充當上中委和候補委員。

該文同時指出:「『胡溫新政』號稱的主要服務對象,即農民與工人的代表一個也進不了權力中樞」。(4)

中共在創黨以後,自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認為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在 1927 年中國革命失敗後,中共被國民黨鎮壓、圍攻,退出城市,轉到農村進行遊擊戰爭,依靠農民為主力,最後打敗了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保持了中共的工人階級性質。但在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市場經濟後,「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之類的假大空話已聲沉響絕,反而是向企業主等廣開政經黨大門,有如上面所說的。隨著將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推行,這種發展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在黨員組成方面,也反映出這種情況。中共中央組織部在 17 大前夕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 2007 年 6 月,工人黨員有 796 萬,比 5 年前增加了 76 萬,佔黨員總數(下同)的 10.8%;農牧漁民 2310.2 萬,增 137.8 萬,佔 31.5%;機關幹部及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 2134.6 萬,增

110 萬,佔 29.1%;離退休人員 1377.6 萬,增 243.9 萬……。(5)但不見企業主一類,估計很可能是被歸隱在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或佔黨員總數 5% 的「其他」部分。

必須真正實行政治制度民主改革

《報告》在標題為「六.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章中,又大言不慚地寫道:「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

接著,在重申「保證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的同時,又重複指明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總攬全局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保證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

總而言之,《報告》念念不忘的是要堅持長期以來實行的一黨獨裁,在這種獨裁之下,人民不但不能「當家作主」,而且無法真正享有民主自由權利,這種權利在獨裁政制之下被完全剝奪了,人民紛紛要求中共開放黨禁言禁,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報告》還誇稱:中國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如果中國這樣的現實真的是社會主義民主,那麼,這樣的「民主」便會一文不值。但事實上,社會主義這個理念是被《報告》冒用、污辱了的。列寧曾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闡明:「社會主義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可是,中國人民長期來連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民主自由也無法享有。

中國人民對這種狀況很不滿,許多人都要求實行政治制度改革,廢除一黨專政,使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原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先生今年

民怨民憤 遍地浮現

張開

中國政府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制度,儘管自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實質上是日益遠離社會主義方向的,中國社會現時充滿著資本主義社會所具有的各種弊害,特別是它所造成的社會兩極大分化,貧富嚴重懸殊,社會不公,各種矛盾和衝突日益加劇,尤其是官僚統治者與各階層民眾之間的矛盾衝突加劇,它的施政又造成通貨膨脹,物價(尤其是樓價)飆升,民眾生活困難,特別是失業工人及其家庭。因此,強烈的民怨民憤觸發更多衝突。

爲了具體地說明這些矛盾衝突的普遍性,嚴重

二月在《炎黃春秋》刊出的文章,指陳政制改革不能再拖延了。中共領導人可能感受到這些要求和形成的壓力,從而在近年講話和此次 17 大報告中也有所提及;但 17 大在行動上卻沒有推動政治改革的表現,沒有觸及到政改的核心問題,即權力過份集中這個政治體制「總病根」(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吳敏先生在《沒有民主就沒有共產黨》一文中的評語)。也因為如此,《報告》高談闊論的「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也都在「堅持黨的領導」,「總攬全局」的控制下變得有名無實了!而它所稱的「擴大人民民主」,意思就是說,中國在中共統治下,早已存在人民民主,現時只是需要加以擴大而已。這都是瀰天的謊話!

由此可以又一次表明:中共新一代的最高領導人雖然標榜開明,「以民爲本」,但卻無有力事實表現;雖然說得異常漂亮,卻經不起實際考驗。17 大產生的領導層即使有些新老交替,但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線和官僚組織方法及作風等都沒有改變,也不會自動放棄其既得特權和權

性,筆者特不厭冗長地列出部分香港報章近幾月所刊出的報導,當然,此間可見到的報導,只是國內已發生事件的「冰山一角」,在官方的封鎖消息和網上檢控之下,有多少不能漏網出國,實難以估計,特別是臨近中共 11 大舉行之際,官方更需營造社會和諧氣氛,封鎖得可能更嚴。

以下是大體上依照事故在今年 5 月底至 9 月底發生的時間列出的。

舉不盡的事例

5 月 30 日,深圳市寶安西鄉愛威電子廠的員工

力。長期以來,不但人民不能享有民主,而且中共黨內也沒有民主,一般下層黨員並不能運用應有的民主權利,批評以至集體改正領導層的缺點、錯誤。期望中共能自我改良,那只會是幻想。

可幸的是,人類歷史是在進步,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大眾不會一直容忍很不合理的現狀長久持續下去,而會起來抗爭、爭取自己應有的民主權利,迫使統治者兌現他們所作的許諾和說過的美好願景的!

2007 年 11 月 10 日

註釋:

(1)07 年 11 月 4 日《文匯報》。除國資委只管 155 家中央國企之外,政法大學一位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指稱,還有 5000 多個國企分散在 80 多個部委國務院部委中。

(2)10 月 31 日《文匯報》。

(3)10 月 15 日《文匯報》。

(4)同見 10 月 25 日《蘋果日報》。

(5)10 月 9 日《文匯報》。

接到廠方不再續簽合同通知後,上百員工圍堵工廠門口。至5月29日已經9天9夜。30日,工廠門口發生衝突,多名工人受傷被送到醫院。(1)

5月30日,寶麗順五金塑膠製品廠(深圳)有限公司爆發工潮。近二千名工人因聽說該廠即將倒閉,擔心廠方任意縮短續約合同期限以躲避支付解約補償金而集體罷工。(2)

5月30日,深圳龍崗雪象村寶吉工藝品(深圳)有限公司近千人罷工。6月2日,寶吉其他分廠員工相繼參與罷工,罷工工人最多時超過8,000人,為深圳建市以來最大規模。(3)

6月1日,雖然廈門市政府前日一聲令下,暫緩興建海滄區PX(二甲苯)化工廠,但是二、三萬名廈門市民,仍響應早前號召舉行波瀾壯闊的「六一」大遊行,他們戴上防毒面具,高舉抗議橫額,要求廈門市委書記何立峰下臺,促請政府停建化工廠,而不是暫緩興建。遊行人士一度和武警推撞,至少五人被捕,市民揚言今日將繼續到市政府示威。(4)

6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200名傳銷商包圍當地公安派出所,要求警方釋放被拘捕的傳銷組頭(負責人),其後更衝入派出所內大肆破壞。官方稱有9名警員被打傷。保定市公安局目前已拘捕數十名肇事者。(5)

6月6日,河南鄭州一名女子在河南財經學院附近擺地攤時,遭城市管理人員驅趕及打傷,引起附近多間大學學生不滿,千多名學生和城管及巡防隊員衝突,推翻車輛,騷亂至昨日凌晨平息。(6)

6月上旬,內地城管(類似香港食環署人員)粗暴執法引發的警民衝突一波接一波。重慶日前亦發生城管暴力執法,將一名在路邊賣花的年老花農打致重傷後,引起公憤並導致數千人騷亂,群眾一度與防暴員警發生衝突,兩輛警車被砸,十多人受傷,其中四人重傷。被城管毆打的花農傷勢危殆。事件更導致南岸區交通中斷八小時。(7)

6月上旬,內蒙古呼和浩特因拆遷問題,日前爆發逾五千居民與數百武警流血衝突。至少20人受傷,其中兩人重傷。其間有三輛警車被砸毀,三名居

民被警方扣押。(8)

6月上旬,深圳布吉一家港美合資工廠爆發工人大罷工事件,該廠數千名女工懷疑及不滿資方準備裁員及拒絕額外發放補償金,連續10天在工廠內外展開馬拉松式罷工。(9)

6月6日,台企東莞萬江區凱元手袋廠50多名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等情況。(10)

6月7日晚,天津交通職業學院因學院對宿舍停電,引發逾1,000名學生騷亂,學生不停的把電視機、廁所門板及滅火器等從高處投下,並有學生把衣物製成火把向下投射。當局派遣防暴公安到場戒備,騷亂持續兩小時,恢復供電後停止。(11)

6月8日,東莞橋頭鎮「運行玩具廠」13名工人因為每天工作13-16小時,連週末假日都不能休息,從6月8日起罷工。(12)

6月8日,東莞市大朗鎮洋坑塘一港資玩具廠因經營問題面臨倒閉,老闆懷疑已攜款失蹤,近2,000工人擔心拖欠近兩個半月的工資不能發放,遂聚集廠區門口罷工。部分工人更一度情緒激動,將廠門推倒及衝向馬路,鎮政府出動數十名防暴員警控制場面,雙方發生推撞,至少3名工人被警方帶走。(13)

6月9日,江西省廣豐縣發生警民衝突。超過200名村民抗議政府興建水電站,用鐵管等雜物阻塞高速公路,其間雙方發生衝突,十多人受傷。(14)

6月18日,浙江嵊州市亦發生當地政府強行拆遷一個「釘子戶」,導致二萬名民眾與數百名公安、武警發生衝突。當中,許多圍觀民眾被武警打傷,最少兩人重傷,據傳一人被打死,另有數人被公安帶走。(15)

6月29日,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一個水電站地盤近300名重慶民工因被拖欠近500萬元人民幣薪金,罷工抗議,水電站所屬的公司找來手持鐵鎚、斧頭和鐵通的打手追打民工,導致1人死亡,2人失蹤,5人重傷。(16)

從6月29日開始,四川省綿陽市雙馬水泥有限公司3千多名工人罷工,反對該國有控股企業原管

理層的貪腐無能和政制對工人權益的損害。(17)

7 月上旬,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岩灘鎮發生警民衝突,近萬名農民不滿政府興建水電站導致農田淹浸,而賠償太低,包圍鎮政府,要求增加賠償。其間雙方爆發衝突,至少 5 名村民被打傷。岩灘鎮派出所昨日向記者證實事件,並指示威人數眾多,當局需調動數百名武警及特警到場處理。(18)

7 月 18 日,遼寧省錦州市公共交通(巴士)總公司逾千名職工因不滿公司由國企轉為私營,令員工福利減少或被迫下崗,18 日起發動罷工,連日來錦州的巴士服務已完全癱瘓,市民生活大受影響。(19)

7 月 24 日,江西新餘紡織廠和化肥廠(化二廠)職工因不滿買斷工齡補償金太低,5 千人舉行示威、罷工。

7 月 26 日,四川什邡市居民抗議華潤啤酒有限公司污染水源,與當地武警爆發衝突。

同日,湖南長沙紡織廠 1 千名下崗工人抗議沒得到合理補償,在廠門口示威,政府以武力驅散工人,抓了幾十人,打傷了幾人。

7 月 30 日起,鄭州市 13000 多輛計程車集體罷工了 5 日。

7 月底,廣州市白雲區經濟合作社逾百名村民,因不滿社領導私自把倉庫出租,圍堵合作社靜坐抗議,並與開發商派來的人員衝突,3 名村民被打傷。(20)

8 月 10 日,湖北省湘潭市譚家山煤礦 800 多名礦工,不滿資方在私有化過程中私吞中央發下來的賠償,開始集體罷工,15 日竟遭資方派來 200 多名保安毆打,混亂中最少一名礦工及一名保安被打死,20 多名礦工受傷。(21)

8 月 21 日,山東「8.17」潰水礦難進入第五天,172 條生命之火也越發黯淡。昨今兩日在華源煤礦公司門口發生了大批礦工家屬與礦場人員激烈衝突,今日下午 3 時左右,商業街家屬區再次發生衝突事件。之前汶河曾發生過七八次潰水事故,但一沒有徹底修繕好。即使如此,此次暴雨來臨時

也沒有引起各方的警覺。(22)

8 月 21 日,位於深圳西鄉的飛煌電製品廠近萬工人第二天罷工,連沙井同廠的八千工友亦響應,他們抗議工廠增加逾倍工作量,薪金卻減少近半。(23)

8 月 24 日,在 2005 年曾發生國內外關注的軍警槍殺示威村民事件的汕尾東洲鎮,再爆發警民衝突。近 2000 名村民因阻止附近電廠施工而與警方衝突,政府調動近千名荷槍實彈武警增援,警民一度打鬥,武警出動裝甲車及發射催淚彈鎮壓,多名村民被打傷。(24)

9 月 4 日,重慶市區 4 日晚發生大規模群眾騷動事件。事件起因是民眾不滿城管(類似本港小販隊)人員毆打小販而引發衝突,城管汽車遭市民焚燒,而到場維持秩序的一些警員也被人打傷,由於圍觀者一度達數千人,現場一帶交通大受影響,政府要出動防暴員警才將局面控制。(25)

9 月 11 日,內蒙、陝西、湖北的三間鐵路學校,同時發生暴亂!參與的 2,000 多名學生,全是退伍軍人,他們因不滿學校伙食、設備差,疑經互通消息後,於上週一同時燒砸學校設施和車輛。其中一間學校千名退伍軍人與數百公安發生流血衝突,20 人傷,5 人被捕。(26)

9 月 13 日,3 間鐵路學校學生騷亂後,當局緊急下令全國 12 間鐵路學校的退伍軍人全部休學並遣送回原籍。此舉導致黑龍江齊齊哈爾市鐵路學校學生不滿,近千名學生發生騷亂,與到場的公安及特警發生衝突,至少 10 人受傷。(27)

9 月 29 日,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發起了一場通過互聯網掀起的維權行動。該校兩名學生,在校園內的修車舖維修單車時,突遭包括店舖老闆在內共七人圍毆。有目擊學生將事件發表到網上論壇後,瞬即得到大批學生回應,對受害者表示同情,300 名學生將該舖包圍,誓要討回公道。憤怒的學生開始拆舖前的陽篷,不少學生用木凳、磚塊砸向店門和屋頂,並將附近的垃圾全部倒在店門口。其後,有人用硬物將大門撬開,眾人衝入舖裏將

雪櫃等物打爛。(28)

9月30日,廣西著名旅遊景點桂林陽朔遇龍河,因當地業者不滿政府強行收回其遊河服務,並轉由一家公司承辦,數十名划船工及導遊上街抗議,其間與警方發生衝突,至少有8人受傷,一名武警開槍,十多人被捕。部分劃工則發起罷工行動,令當地遊河活動幾近癱瘓。(29)

兩年來不斷爆發警民衝突的廣東省汕尾東洲村,再次發生暴力事件,有數千名村民在9月27日晚前往興建架空電纜的地盤,阻止發電廠人員再次施工,村民與數百名民警,以及發電廠的臨時工人發生衝突。(30)

冤屈何處訴?

從以上所引祇在最近4個月之內「漏網」出來的事件,已經有這麼多,涉及的遍至中國社會低下階層民眾,包括工人、民工、農民、城鄉居民、學生、甚至退伍軍人,等等。他們積聚著巨大怨憤,無數人都忍無可忍,被官迫民反,爆發了出來。也有許多人寄望於法律和司法公正,於是訴之於當地政府和法院,但大多數人都有如與虎謀皮,地方官僚幹部本身正是欺榨者,壓迫者,他們貪污腐敗,利用手上權力肆虐,榨取民脂民膏,民眾投訴沒有結果,即使在地方逐級上訴,也往往遭到官官相衛、幹部狼狽為奸所阻撓,於是許多受害者越級上訴,多年來出現巨大的上訪潮,最後是到北京上訪,或者是上訴到最高法院,當事人希望通過來信和來訪,尋求法律外的解決途徑。

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2006年3月11日在人大會議上的報告:近年來,涉訴信訪數量居高不下。2005年,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案件5143084件,辦理涉訴信訪455242件(人)次,法院每受理約12件一審案件,就要受理1件(人)次涉訴信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共辦結各類案件3196件,而

處理來自全國各地的涉訴信訪卻高達19695件(人)次,平均每個工作日辦理涉訴信訪達79件(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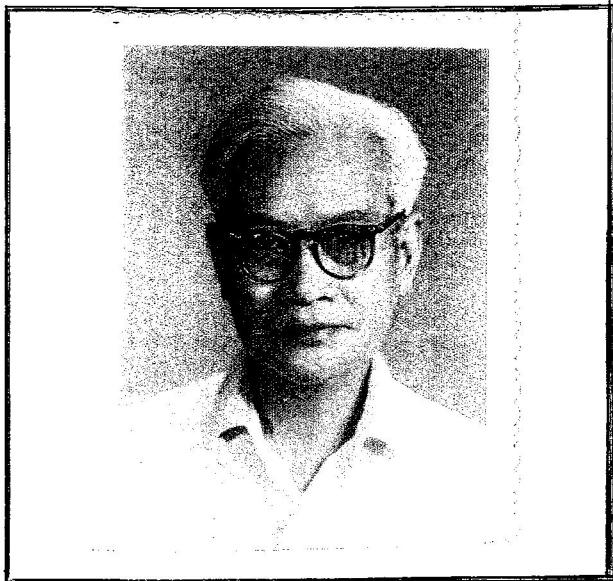
可是,法律,法院,法官等等都是替統治階級或階層、資產階級服務的。即使級級上訴到最高法院,也難以得到滿意解決,因而要訴之抗爭。由此可見,中國社會矛盾的嚴重化尖銳化,已帶來中共統治危機的深化和廣化。各地方幹部靠用軍警加以鎮壓,只是把民怨民憤壓抑著,積累著,而沒有消解,更大的抗爭總會有一天爆發出來。黨幹部這種野蠻行為,實是對黨總書記胡錦濤所宣揚的科學發展觀、以民為本、構建社會和諧等主張構成極大的諷刺!

2007年10月10日

註釋:

- (1)(2) 07年5月31日 <<文匯報>>.
- (3) 6月15日 <<文匯報>>.
- (4) 6月2日 <<蘋果日報>>.
- (5) 6月5日 <<明報>>.
- (6) 6月8日 <<明報>>.
- (7) 6月10日 <<蘋果日報>>.
- (8) 6月14日 <<蘋果日報>>.
- (9) 6月9日 <<蘋果日報>>.
- (10)(12) 同(3).
- (11) 6月8日 <<蘋果日報>>.
- (13) 同(6).
- (14) 6月17日 <<明報>>.
- (15) 6月24日 <<蘋果日報>>.
- (16) 7月2日 <<明報>>.
- (17) 7月18日 <<21世紀導報>>等報導.
- (18) 7月11日 <<明報>>.
- (19) 7月22日 <<明報>>.
- (20) 以上5起事故引自<<港支聯通訊>>第74期.
- (21) 8月17日 <<蘋果日報>>.
- (22) 8月21日 <<文匯報>>.
- (23) 8月22日 <<蘋果日報>>.
- (24) 8月26日 <<明報>>.
- (25) 9月6日 <<明報>>.
- (26) 9月12日 <<蘋果日報>>.
- (27) 9月15日 <<明報>>.
- (28) 10月1日 <<蘋果日報>>.
- (29) 9月30日 <<明報>>.
- (30) 9月30日 <<蘋果日報>>

悼念劉平梅同志(1920-2007)



劉平梅同志原名劉廣秀，也稱劉秀，1920年3月30日出生於中國上海市。本月8日，很不幸因病逝世，終年87歲。噩耗傳來，同人等深感難過。

劉同志在中山簡易師範學校讀書時已接受革命馬克思主義，抗戰爆發後第二年9月，他們的導師高輩(即《求真》雜誌發行人高擎宇)帶領大部份劇社成員與一群志同道合友好組成「克克劇社」，再併入中山青年戰時服務團(以下簡稱中青團)，團員大多為信奉托洛茨基主義者。中青團的工作主要是宣傳抗日，號召群眾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政權，人人出錢出力，積極支持抗戰。同時經過組織的劇團，到各鄉村演出抗日話劇。劉秀在1938年8月加入托派，執行組織定下的工作任務。

38年冬，托派組織決定發展武裝群眾抗日，中青團派出了劉秀，陸續等幾位同志參加國民黨所收編組成由袁帶屈仁則統領的第四戰區第一縱隊，希望通過這項「政訓工作」，發展農民武裝，但後來發現這個部隊仍帶有深重的流氓土匪作風，絕無可能憑它可以達成我們的願望，於是祇好放棄原定計劃。劉秀等人也接受了組織的決定，藉口回校復課，退出了這個縱隊。

39年8月間，國民黨中山縣黨部要中青團服從

十月評論社同人

國民黨領導，接受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中青團不接受，被國民黨出動警備司令部部隊包圍其團部，要拘捕其人員，各人幸而事先聞風躲避，不致遭到逮捕。但最後卻被迫要自行解散中青團。39年冬中山淪陷，劉秀隨後到香港工作。

他在香港住在筲箕灣工人區，與其姊妹一起，嗣後香港也被日軍攻佔，他和姊妹們逃到山上躲避日軍炮轟，但也被日軍搜到山上，向他砍了幾刀，幾乎要了他的命，他暈了過去，醒來後在山上小屋過了3天才幾經艱難痛苦地下山醫治，幸而奇蹟地生存了下來。他後來轉到廣州居住。

1952年12月22日，在中國大陸解放後的全面大逮捕托派份子行動中，劉秀也不能倖免。後來，他與一些托派同志被判處無期徒刑，在1979年才得以返家，但還要受到監視。

他在損失了青壯年的大好時光之後，從老年時開始，才能在家專心致力於研究和撰寫許多歷史和理論問題的長文。本刊從1993年初(總第164期)起，便分期刊登他用劉丹青筆名寫的《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問題的爭論》，和總第173期起連載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托派》(用馬懷士筆名)，《蘇共黨內工會問題的爭論》，《俄國革命與不斷革命論》。此外，還有用馬騰雲、前戈、林丹、林青等筆名寫的評論、書評，等等。由此可見他的努力和筆耕成果，對讀者從事歷史理論研究會有所幫助。

劉秀同志以如此高齡，且身患多種長期病痛，仍努力寫作，確是很難得的。他的大半生，與許多托派同志差不多相類似，都是為了追求解放全人類的理想，而受盡壓迫、苦難折磨，但矢志不移，堅強不屈，歷史終將會給他和他的同志以公正的評價的！

2007年12月10日

憶劉平梅

熊安東

在監獄裏，我見到的同案中，始終不承認反革命罪的只劉平梅一人。爲此，他少不了經常挨批判，甚至被逼迫低頭認罪，他都是沈默不語以示抗拒。批判他的人與他無私人仇恨，批判一個不認罪的活把子是機會，出於自我保衛本能，借此向專政當局表態。

被判刑、關押二十年後，1972年8月28日，我們一個人一個人地被通知，拿好自己的東西，調離監房。只劉平梅一人沒被通知，他仍留在監房裏。他看著我們一個一個地走了，他不知道我們被調到那裏去，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調到那裏去。到了一間辦公室，我們才知道：寬大釋放，但不放，從監獄關押轉移到勞改農場受管制。

我們到農場安頓下來二十多天，一部小汽車把劉平梅送來了。我立即猜想，把他一個人關押了二十多天，一定是經受了精神壓力或其他，他的態度有所轉變了，才放他出來。

我的猜想完全錯了。

劉平梅被送到農場的第二天，來了許多幹部，有公安局的，有監獄的，還有一穿軍裝的可能是軍代表。農場的專職管教幹部陪同他們到劉平梅住的房間找劉平梅談話。管教幹部叫我去燒開水準備泡茶，叫其他人都回到自己住的房間裏，不要隨便走動。

灶間在劉平梅住室的對面。他的屋門關著，屋裏的談話，我聽得不十分清楚。屋門開了，幹部們準備走出時，一位幹部高聲地說：“你這種態度，叫我們怎麼向上交待！”這句話我聽得清楚，到現在都不忘。從這句話裏使我知道劉平梅的態度沒有改變，他仍

然耿直、堅持、“頑固”。“頑固”得使政府幹部都感到棘手。

判刑、關押、強制改造了二十年，都沒有把一個劉平梅改造得自覺地說假話，做假人。最後單獨關押他二十多天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再找他談話，他仍然“頑固”，使“對罪行有所悔改，寬大釋放”的政策不能自圓其說，使政府幹部無可奈何地講出：“怎麼向上交待！”

我提著開水到管教幹部住的房間兼辦公室去沏茶，那位高聲講“叫我們怎麼向上交待”的幹部問我：“你說說，劉平梅是怎麼回事？”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使我立即想到二十多天前在監獄辦公室的一幕。一位幹部把我叫到身邊講：“你的改造表現不怎麼好哇，還要繼續改造思想。”現在叫我說說劉平梅是怎麼回事，明擺著是考察我的思想。我回答：“劉平梅脾氣怪，對他，我不十分瞭解。”我沏好茶，又灌滿保溫瓶後迅速離開了管教幹部的住室回到自己屋裏。

回到屋裏不久，看到兩名幹部從我窗外走過，又去劉平梅屋裏，不一會功夫，他們又從我窗外經過，回到辦公室。來去匆匆，不知他們向劉平梅交待了幾句什麼話。他們回到辦公室不久，就聽到幹部們乘車離去的馬達聲。管教幹部隨即在院子裏巡視一圈後，也出門去了農場場部。我們住所的院子裏又恢復了寧靜，我呆坐在自己屋裏，好半天心情沒有寧靜下來。

我們由監獄關押轉到農場受管制七年後，1979年6月5日，劉平梅同其他人一樣拿到一份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書》，裁定書上寫有：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寬大釋放，

給予公民權，等語。真是解鈴繫鈴，筆下生花。一場為洋大人祝壽的鬧劇謝幕，留給後人評說。

把我們安置農場受管制期間，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費六十元，花不完的。響應政府號召，把多餘的錢存到銀行裏，支援國家建設又生利息，公私兩利。從1972年到1979的七年間，劉平梅在銀行存了二千多元，是我們六人中儲蓄最多的。1979年6月離開農場時，我們把存款本金和利息全取出，銀行收回存款單據。劉平梅認為利息屬於剝削，他

分文不要，只取出存款本金，銀行沒有收回他的存款單據。

2001年5月劉平梅到溫州參加陳獨秀晚年思想學術研討會後，來上海逗留兩天，我曾陪他到附近小公園散步，他談起了獄中被批鬥事。樹林裏掛著幾隻鳥籠，畫眉鳥在籠裏鳴唱。劉平梅說：“看到這，有點條件反射。”時已過，境已遷，心靈上一道傷痕難抹掉。

六年前相逢又分手，竟成永別。

寫於2007年冬至日



福田政權的修正路線走向

趙京

一年前，筆者以《安倍政權粉墨登場》簡要介紹了試圖“克隆”（低劣冒仿）小布殊政權的安倍內閣的丑角特徵。戰後出生的安倍狂妄地把推翻日本憲法中的和平條款設定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標，妄圖在自己的任期內把“集團自衛權”合憲化。所謂“集團自衛權”就是指當日本的軍事同盟國（目前只有在“安保條約”體制下的美國）行使“自衛權”（例如小布殊政權“預防性自衛”侵略伊拉克）時，日本“自衛隊”海外出兵“集團”參戰，是符合憲法中的“放棄戰爭”、“不擁有軍隊”條款的。

這樣的“法匪”邏輯在安倍登場後的一個月以後的美國中期選舉（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初）中落為泡沫。在安倍的主子小布殊無法控制美國參、眾兩院的情況下，日本的選民在今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中使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公明黨喪失控制多數席位的地位。按照普通常識，安倍就應該下臺，尚不失體面。但不知羞恥的安倍在九月八日的會談中向小布殊效忠，保證自衛隊繼續支援美軍，獲得美國主子的支持而拒絕卸任。在“九·一一”以後，小布殊當局利用美國民眾的驚恐發動了侵略阿富汗的戰爭。當時的小泉政權利用日本民眾的部分同情心制訂了所謂“反恐特別措施法”支援美國侵略阿富汗的戰爭，其中包括派出自衛隊在印度洋公海上為美軍加油等。作為侵略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早已告一段落，此“反恐特別措施法”也將於今年十一月一日失效。但為什麼安倍甘心以政權為賭注要延長此“反恐特別措施法”呢？因

為此“反恐特別措施法”實際上偷換為支援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日本自衛隊在印度洋公海上為美軍加油的數量從對伊拉克開戰前的每月 20 萬加侖到今年 9 月的 80 萬加侖。日本對美軍在伊拉克的戰爭的主要實際支援就在於此，失去日本支援的美軍會進一步加深小布殊當局繼續伊拉克戰爭的危機。

安倍在獲得小布殊的贊許後回到日本，立即召開臨時國會，發表演說，擺出架勢要強行延長“反恐特別措施法”繼續執政。不過，這一次，在野黨早已看出安倍的花招，連自民黨內部的麻生等實力派也在準備新的法案以備後路。走投無路的安倍在兩天後就只得宣佈辭職，逃入醫院，結束了短暫的安倍政權。

在這樣的鬧劇中誕生的福田政權當務之急是收拾安倍拋下的爛攤子。為了執行日本首相向美國總統許諾的“國際公約”，福田必須取得反對黨自由黨的同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任自由黨魁小澤正是冷戰結束以來推動“集團自衛權”合憲化的禍首。現在，從小澤的口中竟然冒出“憲法”的重要性以牽制自民黨，可見日本憲法對於政客們是多麼的一錢不值！

畢竟，福田政權的成立，是對安倍軍國主義冒險路線的否定，同時也迫使它對小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路線進行修正。可以預測以下幾點變化：

俄國革命九十年仍在

大衛·曼德爾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事件。然而由於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撰寫，不大爲人所知的是，十月革命是向橫行工業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出有力挑戰而打響的第一槍，並在殖民地國家產生了強烈反響。在 1918 到 1921 年間，遍及各地的工會成員數目和罷工的天數都達到了新的高潮，同時，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派的地位也得以提升。

在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芬蘭都發生了以工人階級爲主要力量的革命。在義大利、在法國和波蘭的部分地區也曾經出現過革命情形（那是真正的一觸即發的革命前夜）。在 1919

巴黎和會的備忘錄中，英國首相這樣寫道：

“整個歐洲呈現一派革命態勢。工人們對於戰前存在的生活狀況有著極大的不滿情緒；他們滿懷悲憤。整個歐洲當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受到了廣大民眾的質疑。”

北美也同樣沒有逃脫這種動盪局面的衝擊。加拿大在 1919-1920 年間經歷了大規模罷工，包括數起全城規模的總罷工。大多數罷工者走上街頭並與其他工人團結一致，一派激進之態勢。當時的總理 Robert Borden 後來回憶道：

“一些城市中出現了組織嚴謹的鬥爭運動，試圖推翻當時的政府組織，運用從俄國革命中獲



一、在外交方面，福田政權將與小布殊當局稍微保持一定距離，而準備與明年美國大選後的政局配合，在某種場合（例如，十一月一日以後由於“反恐特別措施法”的失效而被迫暫時中斷自衛隊對美軍在印度洋上的加油支援）會請求美國的“諒解”。同時會加強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的聯繫。例如福田已經表明在任內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如果朝鮮北方在“六方會談”中就解除核武裝達成實質性的進展，日朝關係可能向正常化方向發展。

二、在內政方面，福田政權會向自民黨妥協，接受甚至採納一些自由黨的主張，因爲它們之間本爲一黨。考慮到日本經濟（特別是股票市場）的低迷，這兩大政黨背後的財團會促使兩黨合作，在諸如“政黨資金報告透明度”方面會達成一致，減少由此帶來的醜聞導致政局不安，甚至會出現超級聯合

執政局面。這兩大政黨，加上公明黨，佔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國會席位，可以毫無障礙地制定任何法律。這可能帶來日本戰前那樣沒有反對黨的“大翼贊”體制，使國會民主體制名存實亡。

三、在社會政策方面，福田政權會修正極端私營化、一味強調自由競爭的加劇貧富差距的小泉·安倍路線，回到傳統自民黨的“共生”政策理念上，力圖減輕社會矛盾。例如，日本政府在教科書檢定中取消了關於在沖繩戰時日本軍隊強迫民眾集體自殺的記述，引起強烈抗議，福田被迫表示要重新考慮。

看來，福田政權可能會有較長的生命期。

（2007 年 10 月 3 日於美國 聖拉蒙）

得可笑理念，用一些粗野且異想天開的方法取而代之。在一些社區有必要用鐵的手腕來鎮壓革命，而從那時起，我沒有退縮過。”溫尼伯（Winnipeg）大罷工演變成了小規模的內戰，在員警加入了罷工隊伍後，聯邦政府不得不裝備起一支中產階級國民軍來進行鎮壓。其實，遏制和暗中破壞工人力量是政府在當時建立加拿大皇家騎警（RCMP）的動機之一。總感覺市政員警和地區員警本身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美國，工會成員數量在 1916-1920 年間翻了一番，達到 5 百萬人。1919 年，占全美工人總數 20% 的 4 百萬多工人罷工。同一年，36 萬 5 千多位鋼鐵工人策劃了美國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罷工，而西雅圖（Seattle）發生的一次總罷工使整座城市陷入了癱瘓。



但是除了俄國，其他各地的革命風波都被無情地鎮壓了下去。其中失敗的根源在於法西斯主義的得勢（法西斯主義是反工人、反社會主義的運動，它到處贊同同情資產階級，且經常受益於資產階級的物質支持）以及斯大林集權主義。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是前德國社會主義革命領袖，於 1919 年 1 月被原法西斯主義成員暗殺，他恰當地評價了人類在“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之間不得不做的選擇。

但是，如果西方革命風波的失敗與法西斯主義抬頭之間的關係相當清楚的話，那麼前者與斯大林主義興起之間的聯繫就不易理解了。

1917 的俄國共發生了兩次革命，一次在 2 月，另一次在 10 月。1917 年 2 月的革命推翻了沙皇極權統治，民眾當時並無意向資本主義提出挑戰。這就可解釋為什麼他們允許自由主義者——有產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和貴族）的主體政黨組建臨時政府。而工人和農民的目標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土地改革（沒收地主的土地並無償分給農民），放棄俄國帝國主義戰爭目標以建立積極、民主、和平政策，和八小時工作制。

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黨派包括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黨人都支持自由主義政府。然而，列寧在 4 月初返回俄國很快就使布爾什維克發生了轉變。他之所以能這麼快實現這一點，是因為其政黨具有壓倒性的工人階級的普通成員和中層領導很早以前就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出結論：有產階級反對民主，並強烈支持俄帝國主義。根據這一觀點，只有在工農政府領導下，反對有產階級，革命才可能成功。但在二月革命帶來的表面上全國統一的欣快時期，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暫時丟棄了如上觀點。

在 1917 年 4 月，列寧的主張真正創新之處（概述於他著名的《四月提綱》）是他號召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至少社會主義革命是布爾什維克所關切的。基於列寧對世界戰爭及在戰爭國家中革命可能性的分析，他在 1915 年時得出上述主張。但事實上，在其他蘇聯社會主義左派中，托洛茨基甚至更早就已推斷出：無論其最初目的是什麼，只有推翻資本主義，蘇聯的革命才可能成功。

自 1917 年 4 月起，布爾什維克就號召要組建蘇維埃政府和由工人和兵士（後者絕大多數是農民）在二月革命期間就已選舉出來的議會。這是一個剝奪有產階級公民權的唯一的民眾政府。該主張起初並沒有得到太多民眾的支持。民眾認為並沒必要疏遠有產階級，因為他

們在二月革命期間好像都已經參加革命了。況且這會引起誰也不願看到的內戰。彼得格勒（俄國西北部港市，革命後改名列寧格勒）的金屬業工人，作為工人運動的核心力量，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外，在俄國首都，一些城區的蘇維埃在二月革命期間自己要求建立蘇維埃政權。

以後的 8 個月裏，民眾沒有積極回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部分臨時政府遭受破壞，企業資本家用關閉工廠的行動來支持反革命，民眾面臨日益加劇的反革命軍事行動的威脅。此時，布爾什維克主張的正確性對公眾而言變得顯而易見。全國民眾都要求把政權立即轉給蘇維埃。這一主張終於在當年的 10 月 25 日，也就是西方朱利安日曆的 11 月 7 日以最小的流血犧牲得以實現。

據此觀點，十月革命應看作是對二月民主革命（反對行將發生的反革命威脅）的保衛式行動。然而由於這第二次革命的對象為有產階級，它必然地解放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動力。同時，十月革命不僅僅是一次保衛行動。蘇維埃奪取了政權，並希望在西方社會影響和推動民眾以俄國的革命為樣板進行革命運動。這不單單是一種國際理想主義的表現，而且被視為革命生存的基本條件。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把俄國視為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業國家，缺乏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政治條件。因而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推行需要西方發達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並且還有更多急需解決的、在沒有西方社會革命支援的情況下無法找到解決辦法的緊迫問題。本來，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就從來不會接受發生在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事實上所有工業國家（及一些非工業國家）派軍隊反對蘇維埃，和/或資助本地的反革命力量。他們還在經濟和外交方面設置障礙，反對蘇維埃政權。

另外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過大的農業比

重，農民佔全國人口的大約 85%。農民會因布爾什維克搞土地革命並讓俄國脫離帝國主義戰爭而給予支援，但是作為一個階級（特別是他們中的進步和中間分子，後者為大多數），他們是自發的集產主義者。一旦分到土地，他們就會反對工人，而工人就會被迫接受集產主義措施來保衛革命，並保證他們自己的生存。

這一分析並不僅限於高層布爾什維克領導，還廣為工人階級所接受，而工人階級強烈反對西方階級鬥爭的盛衰和沉浮。孟什維克作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起初也拒絕支持十月革命，認為俄國缺少社會主義條件，但後來也贊同這一分析。這就是為什麼最後在 1918 的德國革命爆發時，這一政黨中的大多數人都聯合一體，同力合作於蘇維埃政權的原因。故此，西方的革命也成就了俄國的十月革命。

不同於所有特例，俄國的革命在經濟幾近崩潰的情況下把零散的軍隊組織起來，在飽受資本主義世界排斥和隔離的情況下生存下來並取得了勝利。這主要是因西方的工人運動高潮而成為可能，因為工人運動限制了帝國主義政權的軍事干涉力量。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巴黎的政治家端坐在堅實地面的薄殼上，而下面卻是一觸即發的社會變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說明聯合政府不能實現白俄羅斯的願望並運用大量軍隊進行干涉的原因：沒有可靠的軍隊。主要政治家們和軍事家們的意見相同，往俄國派遣大量軍隊，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倒戈。

對於邱吉爾派遣更多軍隊的要求，英國首相的答復為：“如果英國對布爾什維克採取軍事行動，英國自己就會變成布爾什維克而我們在倫敦就會有蘇維埃。”這可能對布爾什維克的即時威脅有所誇大，但是港口工人拒絕裝載武器，民眾抗議遍佈全國，大罷工無處無時不在，還有更加具有決定性的行動（已經建立

350 個各地工人議會，蓄勢待發，僅差號令）阻止英國與法國一起在 1920 年 8 月採取大規模軍事干預。工人政黨所採取的無私行動，因其總體改革領導而出人預料，成為當時的恰切之舉。並且為革命的生存直接做出了貢獻。

這場革命也頂住了農民的敵意。由於蘇維埃政府的糧食壟斷及其徵購農業盈餘的政策，其實大多數農民並沒有盈餘，使得農民變得疏遠。然而農民也認識到，布爾什維克是戰勝反革命的唯一力量，而反革命會把土地改革淹沒在由農民自己的鮮血彙成的海洋之中。比如，1919 年春在伏爾加中部地區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數月之後，白人將軍鄧尼金依靠農民的支持從南方發起了一場大規模進攻行動。對於布爾什維克而言，這是內戰最危急的時刻之一。他們盡了一切努力，包括鎮壓、宣傳，對中農免稅、以及對參加叛亂者的大赦。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但是，只有當鄧尼金的軍隊開近莫斯科而農民們看到地主又要活靈活現地回到他們身邊並成為直接威脅時，形勢才發生了轉機。當時，叛亂只是自行瓦解，而幾近百萬的農民逃兵又主動返回到紅軍隊伍。

經歷 3 年的內戰和外來干預後，蘇維埃的勝利也讓俄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數百萬人死去，大多數死因為饑餓和疾病；經濟慘遭破壞；作為革命運動推動力量的工人階級死傷嚴重並流離失所。隨著革命的孤立，由於官僚獨裁統治生長並在後來的數年內得以鞏固，這兒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地帶。這就是為什麼斯大林藐視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在 1924 年聲明俄國確實可以建立一個隔絕於世的社會主義的原因。此外，這一“理論”成了其他國家共產黨從屬於俄國官僚寡頭的正當理由，也成了一種號召其他共產黨放棄其自身的社會主義革命目標的策略方針。這個官僚獨裁體制不僅對國外的、尤其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沒有興趣，而且直接感到來自國外革命的威脅。這個體制很快就用鎮壓機器來對付支持它的工人階級，並在後來的六十多年裏維持它的強勢統治。

為說明 1918 年春工廠委員會使工廠全國化（這是 1917 年 11 月布爾什維克所沒有預計的措施）的需要，一位 激進主義分子解釋說：

當時的情況大概是工廠委員會取得了企業的完全控制權。這是我們的革命整體發展的結果，也是展開階級鬥爭的必然結果。無產階級並沒有像當時的形勢取向那樣進一步向前邁進，而是簡單地做了當時的形勢要求他們不能不做的事情。

並且就像許多人所認為的一樣可怕，這意味著資本家徹底失去了對經濟的運作權。是的，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實驗”，正如我們敵人的嘲諷言辭……是的，我們不得不說：俄國工人階級必須做的事就是消滅資本主義並在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重建我們的經濟。這既不是“空想理論”也不是“任意而為”——我們只是別無選擇。由於這事是由工人階級做成的，而資本家在革命鬥爭中被推到一邊，這就只能是社會主義規律……

這會不會是又一個巴黎公社或是導致全球社會主義——這取決於國際形勢。但是我們確實是別無選擇。

甚至在 90 年後的今天，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要制定出一個明確的十月革命的資產負債表，還是為時尚早。但是今天，當那次革命的結果看起來已經所剩無幾時（至少時間才能告訴我們那是不是僅僅為一種幻覺），我們至少還可以說：“儘管是處於絕境，但他們英勇奮起。”俄國的工人階級大膽發動一個有機會取勝的反攻鬥爭，而沒有選擇肯定會失敗的軟弱無力的防守。今天，當人類的生存處於危險之中，工人們肯定可以從十月革命中學到許多東西。

衛眾摘譯自 Canadian Dimension 雜誌，2007 年 10 月號

附注：大衛·曼德爾 David Mandel 是後蘇聯工人運動方面的國際專家，他在 1980 的蘇聯“開放改革” perestroika 事件之後寫作了多部關於前蘇聯的作品。其最後一本書為《共產主義後的工人階級》（Labour After Communism，South End Press 出版）

肯雅人民議會 ——莫巴提亞訪談錄

衛眾譯

你能否介紹一下你自己和你的組織：你的組織在做什麼，它是怎樣建立，它所從事的活動和目標又是什麼呢？

我是莫巴提亞 Wangui Mbatia，現為 Bunge la Mwanachi 的成員，也就是英文所說的人民議會。我們的組織其實是一個群眾運動，並不完全是一個機構，（它是一個群眾運動。）它的產生可以追溯到 15 年前，在一個公園裏的樹下，一群肯雅人席地而坐討論他們所面臨問題。15 年來從未間斷，在那棵樹下天天有聚會，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我們的問題；我們也從中得到了解答；更重要的是，我們擺脫了無知。

人民議會建立的目的就是當無人敢言的時候，我們去代表群眾表達出他們的心聲，幫助他們瞭解不同的事物：有些是關於健康問題，比如愛滋病；有些是關於政治問題，例如我們曾在肯雅憲法修改中做出積極努力。我們也讓大眾瞭解對他們息息相關的問題：比如說法律條款，我們總是和他們討論我們在人民議會上曾討論過的法規，因為我們想確保他們能真正瞭解那些法律法規對他們的意義。

很多時候，我們確實在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去保障大眾的利益能夠得到尊重。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認為肯雅群眾參與到這次世界社會論壇如此重要。這是世界社會論壇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召開。我們大多數會員是普通平民，都不可能購買昂貴的機票去巴西，或是印度。

正是鑒於我們中的有些人人都知道世界社

會論壇的程式，大多數人都不可能或者根本沒有能力承擔去別國參加社會論壇的費用。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在內羅畢召開這個論壇，那我們也能參與其中，然而事實上根據這個論壇運作的方式，普通肯雅人依然很難參與。

首先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是組織世界社會論壇所需要的費用。要知道去參加這個論壇並且參與其中是需要花費很多金錢的。對肯雅人來說，打個比方，如果想在這個論壇中設置一個餐館需要大約\$500。但一個肯雅人平均每天的生活開銷還不到\$1。不難看出，設置一個餐館的花費需要一個肯雅人一年多的收入，確切地說，這樣高的門檻將把我們拒之門外。但是即使我們執意在此建立一個餐館，去參加這個論壇，組織者也會收取每個人 500 先令，這相當於\$6 的費用也將是一個肯雅人一個星期所得。

我們認為這並不公平，因為再次考慮到一個普通肯雅人每天生活開支不到\$1，而我們參加這個論壇的目的僅僅是對他人表達我們的同情之情，或是去討論現存的問題，或是和人們交換經驗，而讓我們承擔如此高昂的費用以至於把我們排除在外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人民議會的作用便在於此。我們構建我們自己的論壇；我們在一個公共公園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免費論壇。也就是上周日、週一、還有昨天。

我們想到今天是世界社會論壇的行動日，我們想如果我們參加這個社會論壇，我們有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所以在公園

的時候，我們提出了幾個關於未來打算的決議。其中一條便是我們要讓大眾都知道，肯雅的食品價格偏高；還有就是世界社會論壇應該對參與機構慎重選擇，這樣才能確保我們不會傳達錯誤的資訊。

我們今天在溫莎餐廳的行動就顯示了這一點。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餐廳作為我們行動的地點是基於多方面原因考慮。溫莎餐廳在肯雅群眾中有著一段很長的過去。肯雅人覺得，這個餐廳的所有者並沒有很好的對待他們。由於國家安全內閣大臣擁有這家餐廳才使得它出名。而他並不受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愛戴，因為他做了許多對人民產生極大傷害的事情。正是由於我們認為他從世界社會論壇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我們有必要在他的餐廳採取一些行動去提醒他，也提醒那些像他一樣的人：我們在這裏，我們也敢站出來。



你認為一旦世界社會論壇結束以後，你們的共同宗旨會是什麼？對你來說，在肯雅它怎麼能在構建組織和鬥爭中起到作用呢？

我認為那就是世界社會論壇中最好的一方面。它讓信念相同、目的一致的人們聚在一起，而這些正是其他論壇所做不到的一點，因為我們大多數成員都通常不可能去世界其他地方，而這次我們卻把世界帶到了我們面前。我們不僅僅把世界帶到了我們面

前，而且是一個我們正需要的世界，我們與和我們有共同語言的人們交流，他們相信的是我們所信念的，他們思考的方式也是我們所思考的，他們想做的事正是我們打算做的事情。

所以，最值得高興的一件事就是世界社會論壇在內羅畢召開，同時使我們能和來自其他地方的運動組織者見面。現在再對我們而言，由於各種的限制，由於我們以前沒有參與，也沒有清楚描繪我們的組織，當然，我們的機會也就在某些程度上被約束。

然而我們這些有創造性的人們，僅僅靠手中有限的資源，我想我們已經觸動了相當數量的人們，照此發展，相比世界社會論壇到來前，我認為我們會擁有更光明的未來。我們現在已經擁有廣泛的支援。比如我們上個星期就利用午飯的錢去印刷用以宣傳的小冊子。我們將它們分發給人們，但不久我們就花光了我們所有的錢。幸運的是，那些參與世界社會論壇的各方代表們很慷慨的幫助我們印刷那些宣傳資料。

我們並不想直接得到金錢贊助，相比之下，我覺得宣傳手冊對我們幫助更大。因此，我們只是簡單地告訴他們去哪里能夠幫助我們印刷宣傳冊，他們也會根據力所能及的幫助我們。而這正是我們所認為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巔峰：力所能及的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就像現在，一位年輕的女士為我們印刷了5000冊，而且是昨天才印好的。

你應該能瞭解到我們已建立起難以置信的同志間親密友誼。我們是否能有機會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呢？我認為能夠如此。那些來訪者已經為我們敞開了一扇通向他們的大門，現在是我們選擇是否更進一步的時候，我想任何人只要見過真正具有肯雅精神的人民，就會發現到我們是一群慷慨大方，熱情

友好，並且在無數次嘗試後，仍然希望用最和平的方式找到改變契機的人們。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會盡可能的避免衝突。然而我們有我們的信念，我們決不會輕易放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來就抵制關閉大門，每一天我們都努力打開那些大門，確實是每一天，只有那樣我們才能走出去和你們在一起，和那些其他在這裏的人們一起。我想世界社會論壇從某些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為自己利益鬥爭的機會。有時當你遇到來自外界的麻煩的時候，並不應該總是覺得那是痛苦。有時候相反會帶給你學習成長的經驗。如此說來，我認為對我們來說，這次世界社會論壇是一個絕佳的學習體驗。要是下個星期它還會舉行的話，我們會有更好的準備。

如果沒有世界社會論壇的召開，內羅畢和非洲的情況又會是什麼樣？肯雅和非洲的激進聯盟又會在未來的幾個月或者幾年內遇到怎樣的挑戰呢？在你看來，哪些事務需要被提上議程或被輔助提上議程？

基本來說，我們在為那些並不想參與主流世界社會論壇的運動組織做一個榜樣；無論它將在哪里舉行，我們由此希望下一屆世界社會論壇能為像我們這些人提供更廣泛的空間。而由我們所實施的兩次行動，我想我們可能已經給其他運動組織這樣一個印象：用一點思維革新，一點創造力，一點自願和一些奉獻，就可以恢復窮苦人民在社會論壇中的權利，特別是那些對於論壇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人們的權利。我認為如果有更多反對的聲音和觀念被表達，我們還能做得更好，因為只有那樣我們才能避免走向只存在統一意見的團體。有時，欣然的反對也是有利於我們健康發展的。

那麼更廣泛地區的政治因素又是怎麼樣

的呢？在你看來，周圍還有那些社會和政治問題會被重新考慮呢？特別是那些在非洲地區的。

今年是肯雅的選舉年，這將是在聯合政府迅速瓦解之後，第一次由人民投票的選舉。所以我們再次有艱巨的任務，我們需要重新指導人們選舉的程式，這將是一個民主選舉的過程。概括地說，我們的機構會在選舉過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然而我們的機構同時面臨著本地和國際角度的問題。舉例來說，我們非常關注戰爭和恐怖主義的趨向，因為本質上這就是對普通民眾造成恐懼的工具。更進一步說，在肯雅，我們堅決反對反恐怖主義法案通過，因為一旦這個法案被通過，肯雅將會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我們將失去所有的公民權利去換取那些針對恐怖主義的保護，但事實是，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恐怖主義存在。由此說來，我們確實在國際事件中起到作用。

我們同時也非常關注不平衡貿易。你要知道我們非洲民眾遭受貿易不平等對待。這是我們願意放到每日議程上的一件事，儘管我們僅僅是一個群眾運動組織，我們能力有限，因為我們所掌握的資源有限，但是革命性的解決問題方式將使得我們走得更遠。同時我們也希望傳達給那些曾與我們見面的人們一條這樣的資訊：在肯雅這個國家，有一個能和他們共事的組織，如果我們能參與其中，我們就一定能創造——也許僅限於本地，但是重大的影響；而這對我們所有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們來說，這是前進的一大步。

2007年2月25日，內羅畢，肯雅

（譯自《國際觀點》第391期）

✦ Wangui Mbatia 是肯雅人民議會的主要成員。

世界社會論壇的發展(節譯)

休伯特

世界社會論壇 (WSF, World Social Forum) 創建於 2001 年, 在歷經連續兩年反對標誌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現行制度的大動員後, 於 2001 年 1 月下旬在巴西阿雷格里港 Porto Alegre 以較小規模 (15,000 人參加) 首次展開。而後, 該論壇很快得以鞏固發展, 開始在拉丁美洲而後在歐洲 (首次 2002 年 11 月於義大利弗洛倫斯 (Florence) 市進行), 並於 2003 年擴展到了南亞 (首次亞洲社會論壇於 2003 年在印度海德拉巴 (Hyderabad) 舉行)。

世界社會論壇 (WSF, 以下簡稱論壇) 起動於反對全球化動員的迅速高漲: 1999 年 11 月在西雅圖 (Seattle) 反對世界貿易組織 WTO, 2000 年 4 月在華盛頓及同年 9 月在布拉格 (Prague, 捷克首都) 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和世界銀行, 還有在尼斯 (Nice) 和哥德堡 (Gothenburg) 舉行的反對新自由主義歐洲的動員行動。在首次世界社會論壇舉辦後, 這一發展壯大趨勢持續存在: 2001 年 4 月在魁北克 (Quebec) 進行的反對美洲元首高峰會議 (Summit of the Americas) 的動員, 和同年 6 月在熱那亞 (Genoa) 舉行的反對 G8 八大工業國的動員行動。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諸多事件並沒能成功抑制住已經發動起來的巨大動力, 而於 2002 年 11 月在弗洛倫斯進行了多次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並取得了很大成功, 尤其是 2003 年 2 月一千兩百多萬示威者反對入侵伊拉克準備工作的行動。第四國際組織和其他革命組織全都捲入了這些反對全球化動員和論壇進程中。就數字而言最大

的兩次世界社會論壇為 2004 年 1 月在印度孟買 (Mumbai) (14 萬人參加) 和 2005 年 1 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 (15 萬人參加) 舉行的兩次, 儘管其中也顯現出在反對戰爭、世界貨幣組織和世貿之動力方面的平息。數年內, 論壇進程的發展範圍已經覆蓋了全球的大部分地區: 拉丁美洲、歐洲 (包括俄羅斯)、亞洲 (主要為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韓國和泰國)、南美[1]和包括馬格裏布 (Maghreb) 在內的非洲。

從社會民主管理者走向革命組織的論壇團隊力量

加入論壇進程的政治力量範圍極廣: 從社會民主力量和基督教民主主義管理者到通過大商貿聯盟 (國際自由貿易工會聯合會 ICFTU 和重組為現在的獨聯體 CIS 的世界工會聯盟 CMT-WCL、還有歐洲工會聯合會 ETUC) 組織起來革命力量, 促進與反對全球化運動的鬥爭物件國際金融機構進行對話的諸多非政府組織, 及與已經提及的大聯盟一起構成了 “全球契約 (Global Compact)” (在聯合國的贊助下組成了跨國企業、聯盟領導力量和非政府組織), [2] 激進社會活動組織 (國際農民組織 Via Campesina、韓國的朝鮮貿易聯盟 KCTU、漁業組織、COBAS、SINCOBAS、Sud-Solidaires) 和極端活動及運動組織 (反戰活動、反借貸活動——Jubilee South 和 CADTM——反對世貿運動, 更不用提世界婦女遊行和像厄瓜多爾的 CONAIE 組織這樣的規模洪大的本土運動了)。[3]

當然，論壇並不承認代表了所有反對資本主義和霸權制全球化的社會動員力量。在這些主要的不被代表的社會力量中，有墨西哥的薩帕斯達運動 Zapatistas。

社會活動在協調上的困難

激進派人士已盡力在論壇所涉及的各個地域尋求壯大其民眾根基。他們已經嘗試（有時也有成功）支持和促成了反對全球化的強大動員力量（最初於 2003 年 2 月發起了反戰動員呼籲）。激進派人士還支持和促成了社會活動大會（Assembly of Social Movements）的發動，這使每次社會論壇都達成了確定性的文告並形成了行動日程，無論論壇是全世界性的還是洲級的。儘管有些波折，社會活動大會還是於 2006 和 2007 年度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功（2006 年 5 月在雅典（Athens）舉行的第 5 屆 ESF 期間舉行的社會活動大會有 3000 人參加，而 2007 年 1 月在內羅畢（Nairobi）第 7 屆論壇最後舉行的運動大會又多出 2000 人參加）。但社會活動在協調上還是顯得不力，並且隨之而來的大運動還是有著難以克服的障礙。如何在國際範圍內把過於分散的抗議行動成功地聯合起來呢？又如何領導關於總體戰略問題的討論呢？

內羅畢第七屆世界社會論壇

這是來自非洲各地的非洲運動一同表達其同新自由主義作鬥爭的願望的一次最大的國際集會。另外，不同的活動和運動〔4〕也因此受益，與把它們聯合起來的鬥爭建立了聯繫。論壇吸引了一萬五到兩萬人參加。因肯雅（Kenya）其本身特點，不可能像孟買（140,000）或阿雷格里港（150,000）預估出參加人數來。如果設想正確，內羅畢（Nairobi）的論壇很可能吸引了

多達 3、4 萬人。

這些社會活動的集會從第一天開始就成功地形成了共識，並為社會活動大會（Assembly of Social Movements）做好了準備。在世界社會論壇召開的前 3 天，人民工會在奈洛比市中心的一家公園組織了一個備選論壇。每天有大約 1 千人參加了這個論壇。從第 4 天起，人民工會又參加了世界社會論壇。

內羅畢世界社會論壇之外：紮根、創建網路、加強協作……

就整個過程而言，國際聯合會是值得肯定的。歐洲社會論壇（European Social Forum）的動態使有能力聯合人們為反對公共設施私有化、爭取社會權力許可等等而戰的歐洲網路得到加強。在南亞地區，世界社會論壇的活動加強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及其它國家）民間力量間的聯繫。在拉丁美洲，全美社會論壇（Social Forum of the Americas）強烈導向對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哥倫比亞計畫（plan Colombia）等等的反對戰鬥。我們將會看到 2007 年 6 月底召開的第一屆美國社會論壇（United States Social Forum）的結果。而在 2008 年，世界社會論壇不再召開，取而代之的是在 2008 年一月 26 至 27 日的全球行動日（global days of action）。第八屆世界社會論壇將在 2009 年舉行。

即便以後積極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活動不再構成反全球化運動的全部，它仍然是重要的。

注：

[1] 第一屆美國論壇於 200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召開。

[2] 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由聯合國秘書長於 2000 年 6 月發佈。它涉及 100 個跨國

公司及 1000 個其他私人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彷彿一個新組建的世界政府。又新加入了國際工會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道達爾菲納埃爾夫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alongside Total Elf Fina）、拜耳（Bayer）、聯合利華（Unilever）、英國石油公司（BP）、殼牌（Shell）、雀巢（Nestlé）、耐克（Nike）...見全球契約網站介紹。

[3] 在阿雷格里港賓館舉行的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上，國際自由勞聯（ICFTU）、界勞工聯盟（CMT）（如今在 CIS 得到重組，擁有一億六千萬成員）同全球進步論壇（Global Progressive Forum）相聯合，後者是歐洲社會黨

（European Socialist Party）及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建立的非政府組織，為參加世界社會論壇

（www.globalprogressiveforum.org）而組織了 11 個主題為“全球化社會影響（Soci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的會議。2006 年，經過一番辯論，全球進步論壇被確認為世界社會論壇國際聯合會的成員。

[4] 反債務活動（anti-debt campaigns）（包括 CADTM）及反 WTO 活動、南非社會活動會議、非政府組織、一些課征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s pour l'aide aux citoyens，簡稱 ATTAC）運動、國際婦女遊行（World Women's March）、無聲運動（the movement No Vox）.....還有肯雅人民工會。

查韋斯和委內瑞拉革命

石托敦

委內瑞拉歷史展開了一個激進的新時期。在選舉壓倒性勝利後的十二月，查韋斯向道賀的龐大人群宣佈：“我們向社會主義進發的腳步無人可阻。”這句革命宣言無疑是向前邁了重要的一步，在委內瑞拉廣大工人和窮人們看來，也是正確的一步。輿論認為委內瑞拉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如今爭論的焦點轉移到誰來領導和如何進行革命。

查韋斯和托洛茨基主義

在 1 月 10 日的就職典禮上，查韋斯公開說：“我走的是托洛茨基的路線——不斷革命。”在另一場合，他幽默地說到他打電話給瑟·雷蒙·瑞沃若請他出任勞動社會安全部長：

“……他對我說，‘總統……可我是個托洛茨基派’。我說：‘好啊，這有什麼關係，我也是個托洛茨基派嘛！我一直走的是托洛茨基不斷革

命的路線。”

國有化，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共和國，團結一致的社會主義黨，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路線——這些信誓旦旦的宣言背後的現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查韋斯誠然是當今最激進的國家領袖，但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歷史上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尤其在 1945 年到 1980 年期間像他這樣的人物甚眾：納賽爾（埃及總統），尼雷爾（坦桑尼亞前總統），薩卡努，歐特加等等。在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二十年間，如上這些人物均被視為沒有希望的忍龍，這也是為什麼查韋斯今天顯得如此出眾的原因。但托洛茨基派們不該忘記人們對這些人物的批評是基於這些政權數十年的表現為依據的。

是的，查韋斯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而委內瑞拉資產階級對他恨之入骨，多次想要通過合

法或非法途徑取代他。該國仍然有一支資產階級的軍隊，政府軍團和最高指揮，仍然保護私有財產。如果油價猛跌，改革將被迫停止，經濟將陷入混亂，查韋斯的支持率下降，然後一場政變或一次成功的暗殺行動就會解決他，或者他會自動減緩甚至反轉革命進程。

他號召一場“公眾力量的爆發”，賦予近期創立的公共委員會更多的權利，這些公眾委員會由 200-400 家庭組成的，在 2007 年在這個項目花費了四百萬元。他設想由這些委員會逐漸取代現存的政府結構，按他的話來說，我們要做的是“拆除資產階級的政府結構”，因為所有的政府都是“生來就是阻止革命”。

至今沒有行動表明將廢止員警系統或解除其武裝，或者在軍隊中建立民主委員會，以其否決權來控制將軍的軍事權力。‘玻利瓦爾州’被控制以使它的州長不是工人階級。查韋斯要建立的市政委員會缺乏前蘇聯式結構的等級獨立性，市政委員會不作為政府權力機構的基礎，僅是一種參與團體和從屬產物而存在。

而國有化迄今所進行的是對原業主全額賠償，而不是強制沒收，因此相對規模較小。查韋斯保證將來的國有化行為將是類似的賠償，這就說明，無論“玻利瓦爾革命”宣揚得多麼熱血昂揚，它本質上還是一種溫和改良。這種國有化的辦法最多只能達到某種形式的官僚資本主義，卻不是向社會主義的通途。社會主義要求富人的財產被無償徵用，工人們親自接管工廠工業。

規劃

但關於市場的關鍵問題仍懸而未解。工廠被工人們接管後應該仍然把他們的產品銷售到市場上，這說明分配的混亂仍然存在。市場機制必須被取消並由社會的經濟計劃取代。必要的前提是，員警力量—保護私有化的武裝力量必須被粉碎並將軍事權力轉交到由工人組成的民兵集

團。查韋斯還沒邁出這重要的一步，工人們必須要自己起來實行。沒有一個健全的工人政府是不經過工人階級著手革命就能建立的。

一個新的聯合黨

12 月 18 日，一次競選團內部的慶祝他連任成功的會議上，查韋斯召集他的支持者解散所有現存政黨，組成一個新的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

12 月 3 日選舉，目前支持查韋斯的聯合黨中，他自己的第五共和運動黨（MVR）獲得總投票數的 41.7%，其他二十多個較小政黨，包括委內瑞拉共產黨（PCV），幫助查韋斯拿到他全部 62.9% 支援率的其餘選票。

查韋斯聲稱現在支援其政府的政黨數目之多是創建“21 世紀社會主義”的障礙，他還說，“那些想保留原黨派實體的政黨可以繼續保留，由他們自行決定，但他們必須離開我的政府組成。”他直接了當地說建立競選網隊是來支持他的總統選舉，並告誡大家他們將會是新政黨的基石機構，而那些“開胃湯”黨派不會為了減輕人們的畏懼心理他申明，“社會主義聯合黨將會是委內瑞拉歷史上最民主的政黨……它將對海外討論全面開放。”

一個革命黨

查韋斯的支持者們將主導任何查韋斯建立的政黨。而如果他保證的在聯合黨內的“民主”引發了關於其綱領、政策和結構的公開爭論，那麼革命者當然應該參與爭論。

綜上所述，今天的委內瑞拉迫切需要的是一個革命黨，一個能為工人階級而奮鬥，並獨立于查韋斯政體的革命黨；一個為組成民主的工人、農民和軍人委員會，並在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中打破委內瑞拉政府而奮鬥的革命黨。只有這樣的政黨才能充分認識到當今偉大的革命潛在勢力。

（衛眾譯自〈工人權力〉2007 年 2 月）

查韋斯是托派份子？

里安·馬克·尤安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是相當富有想像力，他形容喬治布殊是“比拿著剃刀片的猴子還危險”，從來沒有其他國家元首這樣說過。他還自稱是個托洛茨基分子。

新上任的勞動部長約瑟·雷蒙·瑞沃若覺得有必要告訴查韋斯他是個托洛茨基派，總統給他不容置否的回答是，“那有什麼關係，我也是個托派份子！我一直都遵照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路線呢。”

自從 1920 年代到柏林牆拆除，在共產黨中，“托洛茨基分子”一直被意思是一種侮辱。如英國工黨一類的團體，通常含有用心險惡的意味。

有報到說《晨星》的編輯聽到查韋斯的宣佈時的反應就是粗口庸俗。

查韋斯本人很清楚這種宣佈的後果。這說明他想把自己與斯大林、毛澤東和霍查（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這些反民主、官僚作風，且往往殺氣騰騰的“馬克思主義”遺產保持巨大距離。

據說查韋斯閱讀過很多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一定從中發現了托洛茨基所作的是一貫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當時執政的斯大林所作的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要求人們隨時謹記：革命造就的官僚機構也可以破壞革命。唯一的解決辦法是讓年輕人、工人、城市和農村的窮人更大程度的加入到革命運動中來。

它也要求國家機構的轉變一是利用革命的法律系統，更重要的是利用群眾的壓力，使一些對革命的支持者負責任的機構來取代舊的軍隊、員警、和公務員。在委內瑞拉要求由農村的窮人和革命的國家來接管由極少

數人擁有的大量土地。最終，它意味著工人們將控制生產和分配的主要工具。

衡量以上幾條，查韋斯不是個托洛茨基分子。不過他的言論是口頭的虛張聲勢，這說明他吸取了 20 世紀革命血的歷史教訓。1998 年，查韋斯深刻受到布雷爾長期被遺忘的“第三條道路”的影響，如今他不停更換內閣成員，要求大家改變委內瑞拉政黨的腐化舊習。

國會通過了一項授權法案允許查韋斯從明年開始可以通過特定方面的法律，不需要通過國會選舉。該法案剛剛通過，國家議會第二副議長羅伯特·赫曼德斯就說：

“我們生活在革命的年代，而革命的特點就是根本客觀的社會公正和社會正義，對革命家來說，這是刻不容緩的……我們允諾今天的公正而不是未來。”

人們可能會說，在一個資本主義國會制定的法律系統裏革命不可能進行，查韋斯的選舉上任就是對這種非凡權力的說明。

這項授權法案的一部分還將涉及一些被上一任政府私有化的重要工業的重新國有化，如電信公司 CANTV 和其他一些電力公司等。“讓過去被私有化的，都回歸到國有來。”查韋斯說。

政府還計畫把國有石油公司在四個 Orinoco Old Belt 項目中的少數持股轉變成多數持股。這四個項目的共同風險投資者還有美國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康菲石油公司，雪佛龍公司、法國的 Total 公司、英國石油公司，和挪威的耐達石油。他們每天的油產量總和達到 60 萬桶，大概等於委內瑞拉總產量的 18%。

在新內閣的宣誓儀式上，查韋斯宣佈他將廢止中央銀行的獨立計劃，聲稱這種獨立是新自由主義的爪牙。

查韋斯還講到了他們的國家屬性，他在1月9日的演講上說：

“今年的公共委員會上我們需要打破地方限制，首先合法建立一種地區、本土和國家的公共委員會聯盟。我們必須向創立國家公社化的目標前進。”

“那些舊資產階級的政府形態仍然存在，並不安分的活躍著。在建立公共委員會政府和社會主義政府、玻利維亞政府——一個能夠進行革命的政府時，我們必須開始一點點分化消滅他們。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是生來就是阻止革命的，因此，要把一個反革命的政府轉變為一個具革命性的政府，我們的任務還很艱巨。”

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以上的所有都沒有被計入創建工人執政的國家所需的必要條件中。缺乏根深蒂固的革命政黨（詳見上月斯圖亞特派培爾的《社會主義抵抗力量》一文）是最令人擔心的一點。

拉丁美洲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尤其是2001年阿根廷的國民運動，表明他們有動員千萬群眾、質疑哪個階級掌權的能力。但是這些運動都沒有取得政權。這需要那些政黨具有力求階級統治替換的意識。

查韋斯不懈的貫徹和主動推進革命前進。這是在大多革命的此階段中少見的：往往革命8、9年後蕭條和官僚主義就如野草橫生。

在這場需要得到加強的革命進程中，當工人、青年和有影響的人士將社會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成功的關鍵仍是他們的積極主動的參與。



■查韋斯出席集會時，呼籲民眾支持

路透社

十字路口的古巴改革

揚·康拉德

1989 年以來，世界上很多報刊——不僅是那些與邁阿密古巴移民中的“反卡斯特羅分子”有關的——經常聲稱卡斯特羅政權的末日到了。2006 年夏天菲德爾·卡斯特羅住院治療再次成為這種只能稱之為謠言的消息的又一機會。



在蘇聯解體和隨後美國加強了貿易封鎖 15 年之後，儘管被迫突然終止了和那些被稱為“真正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原有對外貿易的 85%，儘管要面對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的政治、經濟壓力，儘管還有相當程度的官僚主義化和某些官僚機構對復辟資本主義的渴望，以及貧窮、短缺和社會分化，但 1959 年革命所創造的古巴社會和政權還是堅持生存了下來。

要緊的是什麼？

如果在世界報刊中經常刊登的報導特別執著於古巴政權的諸多錯誤和失敗，那不僅是因為大多數記者是在試著按照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來理解古巴這個不同的社會，也是因為，這些報刊，就象控制著這個世界的資本一樣，正在期待著古巴社會主義事業的末

日，因為在古巴，重要事項正處於緊急關頭。

鑒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幾乎在全球各地被重建，商品滲透的最後障礙正在被解除，以此來促進剩餘價值（是資本為其自身所保留的勞動價值的一部分，但是只有在所有的產品都被售出以後才能實現）的實現，但是古巴仍然在堅持抵抗。這種抵抗鼓勵人們思考，另一個世界可能是什麼樣的，因為即使古巴的社會制度在世界市場的壓力下不得不有所讓步，她面對商品的絕對優勢仍然沒有投降。

古巴經驗存在的時間之久對拉丁美洲的鬥爭並不是沒有影響的。雖然在全世界範圍內資本對勞動的進攻正在激起全面的抵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在不斷喪失合法性，但是只有在拉丁美洲——在委內瑞拉，在玻利維亞，以及最近在厄瓜多爾——拋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結果是，那些國家的政府不僅談到了社會轉型，而且開始論及“21 世紀的社會主義”。

因為儘管有很多缺點，古巴仍然可以作為這個貧困狀況不斷惡化的大陸的一個參照模型。而且，在上述我們提及的國家中，與帝國主義決裂的政府的出現，減輕了帝國主義對古巴的壓制。美帝國主義在拉丁美洲最近的失敗，尤其是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的失敗就是證據。在以把一切財產都私有化為目標的經濟模式橫行世界 20 年後，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政府重新復興恰恰是國有化的思想也是一個證明。

來自古巴革命的社會制度能夠生存下來看上去有點像奇跡，但是確實是真實的。首先，因為古巴面對帝國主義時的抵抗頗有幾分像神話中與巨人歌利亞搏鬥的大衛。但也是因為古巴社會已經經歷了官僚主義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卡斯特羅主義者領導下的方針導向使得嚴重錯誤變得最糟糕。

危機中的經濟

由於受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而被孤立，古巴革命別無選擇而只有在經濟上向蘇聯集團靠攏。但是這樣一來就必須屈從於克裏姆林宮的要求。首先是要被強加一個把建立在工人的自我管理，生產者的自由協作和民主計劃基礎上的集產主義生產關係排除在外的經濟模式。而代之以一個不給生產者自主積極性任何空間的、中央管理的經濟模式。在實際運行中，成爲一個浪費嚴重的完全依附的經濟體。

這種中央的、等級制的管理正是不平等的基礎。尤其是在隨著與蘇聯陣營的貿易萎縮直至中止、物資短缺加劇的情況下。今天這種模式——仍然錯誤地被古巴領導人與社會主義計劃混爲一談——正處於崩潰的過程中。

一個例子足以表明這種現象的範圍已經有多大：大多數古巴官方統計顯示，平均工資根本不可能 100% 滿足基本食物需要。而經濟學家還在那裏討論這樣的工資能否滿足 80%，60% 甚至更少的需要。如果大家注意到古巴人民不是在過一種奢侈的生活——少數新近富裕起來的人除外——在這個島上人民只是勉強沒有餓死而已，那麼如果再有十幾年工資還是買不起必需的食物，這種事

真的會成爲事實。

換個說法，也就是說經濟生活中真正有意義的部分和計劃並不吻合，可以由此推斷出是其他的社會關係才使得古巴人民得以糊口。那麼是什麼關係呢？是建立在擴大的小商品生產部門、旅遊業和所有能夠帶來好處的往來，包括賣淫基礎上的市場關係。當然也包括所有的地下經濟，從“淺灰色”市場到黑市。

但是也存在各種各樣逃脫了經濟管制的非市場關係，和公民們違反或者避開管制規定互相爲對方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有時候會有金錢報酬，但是由於缺乏一個能定價的統一市場，所以即便如此它也算不上一個市場關係問題。

小商品生產部門和“外匯市場”（可兌換比索）以同樣的方式發達，是古巴經濟無法棄絕市場和中央管制的經濟烏托邦無能爲力的指示器，非市場交換關係的普遍化說明官僚政治無力規劃經濟活動，也說明社會渴望不同的社會關係，因而以一種“異常”的方式來表現自己。

而且，每一個古巴公民，像所有那些知道生活在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怎麼一回事的人一樣，清楚爲了哪怕是部分地滿足他們自身的需求而避開市場關係和（受到員警保護的）管制，必須消耗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精力和創造力。而這些精力和創造力原本是可以被用於爲生產者之間的自由協作服務的。

官僚主義化

由克裏姆林宮強加於古巴的——針對切。

格瓦拉開始進行系統闡述的批評意見[1]——管制經濟產生了一個對古巴社會而言是沉重負擔的毫無用處的寄生階級。費爾南多·馬丁內茲·埃雷迪亞（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一位著名的批判的古巴馬克思主義者，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雖然國家的官僚主義化不能用官僚的數量來衡量，但是數字是雄辯的：根據 1986 年的統計，在 12 年裏（1973-1985），官員的數量就達到了原來的 2.5 倍。”他繼續說道：“許多交流方法都失去了它們原本應該起的作用。從大眾對抗有利的工具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現在都完全變成了宣傳工具，這很明顯完全不是一回事。”

“到處都被強加了東歐的意識形態，甚至達到了這樣的地步，在官方演說中充斥著對蘇聯及其制度假想中的成功的讚美之辭，離譜到認為任何批評在意識形態上都是不健康的。”[2]

古巴革命的歷史性領導人，尤其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總是與官僚階層保持一段距離，有時候公開地以某種姿態處理特權問題。但是同時為了治理國家也依靠官僚階層。

修正進程始於當蘇聯在 1985-1986 年開始與古巴就兩國之間的經濟關係進行磋商的時候，後來為了準備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1991 年 10 月舉行）在 1990 年 3 月開始進行討論，此舉引發了好幾次上萬人規模的集會，人們注意到集會期間提出了上百萬條的批評意見，但是並沒有導致按照生產者自己的意願來運行經濟。而古巴經濟體制仍然是集體財產生產方式和私人化管理兩者矛盾的囚徒。這一矛盾可以通過私有化解決——因此就象在前蘇聯，東歐國家，中國和越南那樣復辟資本主義——或者通過管理的集體化解決，古巴領導人正在勉力維持一種並沒有

多少效率的行政管理。

面臨著蘇聯式制度崩潰的危險，我們已經看到了經濟改革的跡象——1993 年可以合法擁有美元，1994 年重新開放農貿自由市場，1995 年批准外國投資——必須認識到這並非朝著管理集體化的方向前進，而是與此相反。最後讓我們注意從那時起實施的各種措施，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在前述改革停滯的基礎上積累私人財產的可能性。再一次地，這種積累不是建立在社會控制機構的發展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行政和官僚控制的資源基礎上。

過渡與市場

20 世紀 90 年代的經濟改革的主要後果是非常清晰的社會分化。“毫無疑問——費爾南多·馬丁內茲·埃雷迪亞在我們前面引述的採訪中解釋道——與拉丁美洲或者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是最小的。但是對古巴來說就格外地大了，在這個程度上說人均收入的分配可以作為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對照物。然而，我們還是不能說出現了不同的社會階級。”[3] 社會分化已經對制度合法性的主要元素構成了挑戰，而與此同時對金錢的膜拜日益增長，如果不考慮市場關係強有力的滲透和——尤其是受軍方勢力控制的——外國投資（就象通常的一樣，積累和輸出资本）的出現，我們確實還不能讓古巴的新富翁們有積累資本的自由，然而我們還是會看到在非常少的一小群人的銀行帳戶上非常巨大的儲蓄額的出現。我們的這些改革會在明天構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市場關係的重建和對金融標準的依賴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建立在短缺基礎上的中央管制無論如何不能代替市場。市場是一種社

會關係，只有一種單一的高高在上的社會關係會產生枯萎。“計劃——托洛茨基 1932 年寫道，當所謂計劃（實際上不是基於社會需求的知識而是中央管制式的）的第一個災難性後果出現的時候，——被叫停了，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市場實現的。

市場本身的規則必須取決於通過它自身的機製錶現出來的趨勢。部門生產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驗證它們的經濟效益。過渡經濟的體制不用盧布加以控制是難以想像的。前提是，按照其自身的規律，盧布是與其面值相等的。沒有穩定的貨幣單位，商業會計只會增加混亂。[4]”批評了摒棄市場的行為之後，他繼續寫道：“這意味著在現階段，正確的和經濟上健康的集體化不應該導致新經濟政策的取消[5]，而應該漸進地重新制定方法。

然而，官僚主義貫穿整個過程。面對新經濟政策實行的不均衡，官僚主義扼殺了新經濟政策，擴大了強迫手段的使用範圍並取代了市場規律”。[6]他最後總結道：“在冒險主義攻勢之後，有必要實施經過盡可能深思熟慮的撤退計劃。”[7]。

在此我提到俄國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辯論中的措辭，是因為從史達林主義者那裏借用來的經濟圖解深深地打上了思考轉型社會，首先是古巴，的烙印。並且因為關於市場消極影響的批評會導致倉促下結論，因而足以使人們摒棄市場。現在的市場關係是社會關係，是與一定的物質生產水平相對應的，不能“被清算”。

如果市場被取締，它們將以一種偷偷摸摸的方式表明它們自己，腐蝕其他所有經濟機制的基礎。但既然這是社會關係的問題，就可以通過建立其他可能的社會關係來獲

得控制市場的辦法。市場只能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有意識的集體協作進行有效地控制。而不是求助於依賴高壓的官僚主義行政官員。因為這些人，就象被蘇聯、東歐、中國和越南的經驗所驗證過的，遲早會由於對社會關係的適應和被它同化而完蛋，從而產生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而這種社會關係本來是應該由他們控制的。

保衛勝利果實

在領導古巴革命的那一代領導人即將必須離開政治舞臺的這一刻，古巴社會處在十字路口。她成功地在最近 15 年保持了非資本主義路線，即使是以引發了內部矛盾為代價。無疑，這是古巴領導人有意識的選擇。同樣，古巴領導人已經顯示自己是有能力與那些因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它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被孤立的國家建立國際主義關係的，在委內瑞拉，在玻利維亞，以及——最近——在厄瓜多爾。古巴的援助對委內瑞拉“玻利瓦爾省革命”所取得的進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即使在那些歸根到底只有靠他們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復辟保衛古巴的人眼中，由於缺乏一個能夠容納古巴大眾自主能動性的機構，哪怕是部分的重建市場社會關係以及行政控制的話題，都會使人民更加消極和憤世嫉俗，喚醒年輕人[8]中的看法，削弱古巴制度的合法性。

曼努艾爾·巴斯奎茲·蒙塔爾班（Manuel Vazsquez Montalban）提出以下相當簡潔的準則：“古巴革命應當保衛本身的最精華部分，並且為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的日益全球化的人們提供可供選擇的範例。但要做到這點，它必須克服自身的最壞的部分，這一部分

對參與機制，批評和權力機制的改變懷有敵意。"[9]有一個在等待答案的懸疑問題是，古巴革命是否還有生命力支撐到棄絕“自身最壞部分”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如果古巴工人沒有忍受過如此強大和曠日持久的折磨，他們就再也不能共同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把未來握在自己的手中。

注釋：

[1]特指他關於蘇聯經濟指導手冊的批判。見Michael Lowy和Celia Hart所著《我們在古巴》系列叢書。

[2]見1998年7月Eric Toussaint在哈瓦那採訪Fernando Martinez Heredia的文章，在緩慢的步幅革命(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出版，批評古巴現狀的方法(Approche critique de la réalité cubaine)(由Yannick Bovy和Eric·Toussaint編輯), Cerisier版, 2001年, p.80。對那些讀去的人而言，這本合刊包括了重要馬克思主義者、

古巴人和非古巴人的創作，對古巴今天的任何一次討論仍然很有價值，是並不過期的指南。)

[3] 同上 p. 85。

[4] 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932年著《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開拓者新聞出版社，紐約1973年，p. 274。

[5]新經濟政策(NEP)1921年提出，包括了經濟領域方面部分回歸市場聯繫的內容。在四年內戰中這一部分被摒棄，因而導致“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種的強制手段實施起來效果不佳。

[6] Op. cit. p. 275。

[7] Op. cit. p. 279。

[8]資本家聚集地(特別是旅遊區域)與主要受行政管理的其他人之間(正式被定義為社會主義計劃)的共存越發像個笑話：“社會主義意味著貧乏，資本主義意味著豐盈...”。

[9] 見《緩慢的步幅革命》的序言(Le Pas Suspendu de la Révolution)。

(譯自《國際觀點》總第386期——2007年二月)

(上接第48頁)

濟決議”，但換句話說，經濟手段決定了一切。人民群眾，格瓦拉強調，“必須有權把握自己的命運，必須自主掌握財富的積累和消費”；經濟上的技術問題必須按照這個大前提進行操作——人民決定一切——“人民的意願必須被實現”。這個主題與之前的觀點保持一致：他寫道，“通常，國家大事應該由工人們來決定(稅率的增長，財富的積累或消費)”，即使這些計劃是由專家們提出的。我們很難把經濟計劃的決定和實施分離出來，但對於經濟計劃的制定，格瓦拉的觀點與那些民主社會主義者非常接近，比如，權力民主化，政治多元化，組織自由化，但有一點我們不能否認，格瓦拉的這種民主化經濟的新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手記看作是格瓦拉人生道路中的重要一步，為實現共產主義、民主、獨特的斯大林主義蘇維埃模式而奮鬥的一步；但在1967年10月，服務於美國中央情

報局(CIA)的玻利維亞殺手殺害了格瓦拉，他的人生道路就這樣終結了。

► Michael Löwy 米高·洛維是位於巴黎的CNR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學研究所的主任。他曾出過許多書，包括《切·格瓦拉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解放神學》，《祖國家鄉還是大地母親？》，以及《上帝的戰爭：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

注釋

[1] Ernesto Che Guevara, Apuntes criticos a la Economia Politica, Ocean Press, 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Havana, 2006, 397 pages.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86期)

“思想鬥爭”和古巴的資本主義轉化

曼·帕·奧特加

當前古巴的社會正面臨危機。這只有在古巴生活一段時間之後才能體會得到。如果不掌握一定量的普通古巴民眾無法獲得的資訊，無論怎樣要得出這個結論都是很困難的。換句話說，因為資訊的缺乏以及政府操控著所有的資訊，要勾勒一幅適當的嚴肅的古巴現狀的畫面，是一個極度棘手的社會分析過程。

要試圖描繪這樣的畫面，古巴民眾除了歸納概括外別無選擇。然而，古巴民眾能獲得統計資訊的方法非常原始且難以運用：這是個人經歷的問題（根本不會冒犯別人，沒有必要和其他的事情聯繫起來）；這是對出現在大眾媒體上的資訊（極端地被刪減並受到控制）進行詳盡分析的問題；這是有關以事實為基礎，經口頭流傳，來自於群體或個人經歷的自由評論的問題；最後，這也是有關一些玩笑 ---- 另外一種形式的評論的問題，這種評論可能有也可能沒有事實作為基礎，其真實性有待核實，而正是這樣的評論在某些主題上使得大多數有不同反應的人們從漠不關心到害怕。



古巴人民沒有掌握多少有用的工具去抵禦那些毫無價值的政府“提供的”被反復利用，而

且還可以再反復利用的資訊。有人可能會說現存的不同的政治體制都會做同樣的事，這不是對待古巴人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民眾的原因。但有兩個有力的理由去反駁這兩種現象：

首先，公民們必須在他們所在的社會以及整個世界，為反對國家的霸權行為而鬥爭來擁有獲得資訊的各種渠道，這樣他們的聲音才能夠被別人聽到。

其次，古巴歷史上一直聲稱自己是社會主義。但是，沒有標準的多樣化，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組織辯論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僅僅只停留在理論上（那種來自對他人觀點和理念的包容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們的抽象的自由），這樣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空洞的術語。這樣的社會主義甚至都不值得人們去關注，它的機構僵化，這種僵化就是強權的“社會主義”部門控制著生產活動。

要重新來衡量這些標準的價值，已被那些聲稱自己是“古巴人民的朋友”的人忘卻了的標準，我們想簡要地反映一下當今古巴的一個側面，一個當我們要描繪我們談到的這種情況時必不可少的方面。這就是“思想鬥爭”，它已經廣泛地影響了古巴社會而且世界上大多數人民正以積極的眼光來看待它。

從保護兒童的權力 ...

思想鬥爭開始五年之後，它成了古巴的一種政治行動，在 1999 年 12 月，其目的在於通過深化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和輿論鬥爭來維持歷史上的“革命”的官僚主義，而且其主要對象是古巴人民。

和任何政治行動一樣，思想鬥爭是連同一個事實共同開始發揮作用的：保護古巴兒童享有和

家人居住在一起的權力。我們感興趣的不是伊利安事件的來龍去脈，也不是這個事件最終如何可能獲勝。我們只是想要強調某些要點。

首先，伊利安事件，如果撇開人道主義的因素不談，是一個國際法和相關國家的特殊法律都不得不介入的家庭爭端。

第二，通過一些在邁阿密的不妥協的古巴流亡者，美國以及古巴都忽略了先前的一些看法而進入一場調停的和半合法的鬥爭當中——實際上，事件是由於聯邦調查局力量的介入和比爾·克林頓總統為解決衝突做出的個人決定才結束的。必須注意到，如果我們面對的不是克林頓而是布殊，古巴人民的遊行示威終將是徒勞的。

第三，伊利安事件標誌著古巴在國際上史無前例的勝利，這一勝利鞏固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而且幫助古巴找到了一條深化反美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鬥爭的途徑和通過加強古巴民眾對存在一個王道樂土的認識來產生新的政治文化薰陶的辦法。

最後，伊利安事件發生在古巴複雜的政治局勢之下。當旨在於改善個人生活的移民，不管其合法或非法，由於其數量的增加正在變成一個社會問題時，古巴政府不可能設法再動員人民（長期以來當權派的主要人物們首先呼籲人民要對作為政治體制合法性主要武器的領導人們充滿信心）。伊利安事件在改變古巴對移民問題的看法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必須承認古巴僑民是為物質生活的改善而離開國家的。

... 到思想鬥爭

伊利安事件塵埃落定後，古巴以及它的總司令菲德爾·卡斯特羅為了確定國家未來開始提出一些文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建議”（實際是強加的）。然而這很明顯是在為這場很早就開始而且只有一個目標的鬥爭找理由：保持革命的官僚的中堅分子和新的當權派的權力，和如今已被家長制的福利國家固有的物質和文化的新奇事物所掩蓋了的操縱和壓制國家的手段的重複。

然後思想鬥爭就誕生了。這一政治行動產生了軍隊——這是政治骨幹和意識形態的代名詞，旨在於完成一個計劃，如果我們認真看待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講話，這計劃也就是這個政權的最後一張牌了。如果思想鬥爭失敗了，這就是將要失敗的古巴社會主義，這個政權知道這個情況，所以不會發生的，她會竭盡全力來整日宣傳這種嘗試是戰無不勝的。

為了解歷史上古巴官僚主義的這次最後的一搏，那就有必要研究它的基本原理、基本主張和實現他們的手段。

通信手段的現代化

為了讓思想鬥爭得到推廣，有必要建立一個功能優良的保障基礎。有必要把當今的新技術運用到政治攻勢中去，古巴政權也意識到能接收到其政治宣傳信號的人數是不夠的。所以必須要讓最廣大的民眾能夠看上電視。

熊貓電視的思路就是這樣產生的。古巴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了協議，中國負責以合理的價格銷售一百萬台高質量的電視機。為了分配這些電視機，再次採用了 70 和 80 年代的分配機制：給值得嘉獎的工人發放家用電器。此外，通過對各行各業的壟斷，它撤下了在外匯商店銷售的電視，取而代之的是高價的熊貓電視（大約 450 美元）。但是現在不可能找到很多值得嘉獎的優秀工人，而且外匯商店很快就不不得不把電視價格降低 50%，因為老百姓不願意付這麼多錢買一台沒有保障的機器（很多人對拒絕購買有著頗具邏輯性的理由，他們不信任一個不知名的品牌，這反映了消費者保護意識的存在）。

互聯網在近年來古巴的社會生活中也已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伊利安的“鬥爭”中互聯網是不可或缺的，打那以後古巴政府意識到通過建立自己的數位系統和通過控制公民的使用來推廣互聯網的可能性。目前互聯網只能供企業和政府任命的人員使用。然而老百姓躲避開這些法規，自己私自連接到電話線上，而且人們可以通

過出國工作，來自政府官員的禮品而獲得電腦。

文化的幻想

老百姓能夠接近所謂“綜合大眾文化”是思想鬥爭的基本組成部分之一。根據古巴政府和社會群體組織的解釋，這個名詞定義了公民所應該擁有的平均文化水平。

很顯然，象所有的國家機構一樣，政治和群體組織一定會爲了達到目標而不惜一切代價，他們不會考慮這場運動會使古巴人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付出何等的代價。對於後者，自不必說，別忘了其他類似的運動是完全失敗的（爲上千萬噸食糖的收穫做的宣傳運動；爲了完全向蘇聯社會主義看齊的教育運動，而這僅僅引用了兩個例子而已）。爲了達到綜合大眾文化的目的，古巴政府已經建立了一些系列的文化和科學機構，它們與現代進步哲學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同時依靠其先進的邏輯超過了它，可最終還是沒有對產生一個自 60 年代以來作爲古巴政治領導層目標的新人起什麼作用。

2004 年，在欠發達的古巴只有四個頻道。直到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我們才只有兩個頻道。電視節目除了一個重要的方面外基本一成不變；如果他們增加了數量，但沒有提高質量，那就是因爲思想鬥爭的緣故。

對青年的意識形態招安

新的緊迫的培養醫療教育“專業人才”的計劃在改進古巴社會必不可少的服務方面取得了預期的進步，有些事從 90 年代初以來已經變得很複雜。

在那些年裏，開始了一場專業人士摒棄醫療教育部門的行動，引起了很大的危機。醫療方面，還是得到了保障；這一職業在古巴社會一直存在，爲了迅速解決問題，在頭一年增加位置的數量已經足夠了。

然而，這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得出的，因爲它開始於一場吸引年輕人學醫的運動。於是我們看到了家庭醫生的出現，這是一個在預防藥品方

面取得成功的積極的嘗試。但在過去幾年裏，老百姓總是抱怨這些成批培訓出來的學生的低水平服務質量，不如幾十年前的水準。對於護士和醫療技師情況也一樣（理療師，物理理療師等等）。成千的沒有達到大學水平的年輕人組成了“緊急”醫療大軍來幫助政府彌補失去的時間。

在教育方面情況就更嚴重。同樣的現象發生但形式不同：在多個學科裏的，出現防止教師和教育系統貧乏的“緊急教師”。

據政府的講法，“緊急教師”建立起來使得社會各階層的年輕人都能有機會從事大學級別的職業，這樣就能從新的社會文化計劃和革命的進步當中獲得社會福利。目前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正變得明顯：古巴教育和醫療服務的危機；另一個重要原因，幾十萬的年輕人找不到他們在社會的位子，不管是在教育系統還是勞力市場。

這是兩個因素造成的結果。首先，是產生社會科學尖子的邏輯。大學培養的是精英公民，所有小學生不是都能進入的，反之他們可以通過社會化的和基本的教育系統得到培訓。

第二，如今的古巴沒有什麼吸引年輕人的工作，因爲政府拒絕爲大多數職位提高工資（擔心通貨膨脹）。

因此，年輕人不斷轉向那些能夠給他們帶來好處，有機會達到較高生活水平的工作；旅遊業、私有的服務行業和消費商品生產業，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方面的。所以從 90 年代末以來，已有成千的年輕人被排除在工作和古巴的教育系統之外。這在其他社會是“正常”，但在古巴社會主義裏就不是，在那裏我們可以假設現代（資本家）的合理性並不起作用，因爲它是一個新的社會，或者說是一個正在努力變新的社會，成千的年輕人混跡街頭無所事事，政府的過失實在難以想像。

於是政府正在制定一些條框來讓年輕人有事可做：緊急實施新教育和用工計劃，這能夠控制年輕人的躁動和暫時解決專業人士缺乏的問

題。

但是這些計劃中最荒唐的是過去 3、4 年裏一種新的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的產生。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僅僅學了 1 年的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和一大堆政治的東西就被安排做社會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創造出幾千名“全能的”大學教師 ---- 一名教師既教西班牙語，又教自然科學、歷史和地理 ---- 靠他們以古巴社會主義的最佳方式來“培養”古巴的兒童和青少年。

這些新的，被政府稱為“靈魂醫生”的社會工作者們，負責確認需要及時可靠的社會救助的家庭和個人的案子並轉交給適當的機構。然而很多人抱怨這些無能的粗製濫造的年輕人，他們居然被委以重任去幹即使是最優秀的專業人士都感到困難的事情。

再次重申，我們並不否認的確有些年輕人是稱職的，能夠完成交給他們的任務的，我們也不否認他們中的許多人也是忠於職守的。但是如果把各種因素都考慮進來，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古巴政府的策略正隨著古巴社會的對外開放帶來一些負面的效應。問題是要拉攏這些可能對國家有潛在威脅的青年，讓他們忙於某些事務，因為他們在其工作單位會加入群眾組織，這樣就有可能控制他們。

保留精英分子

這裏涉及到的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它旨在於保留住這些新的政治精英、新的領袖、古巴“社會主義權力”的鞏固力量，以及這個島上所有政治活動的領導人物。目前古巴的政治行動就是對人民的全面控制 - 主要是針對年輕一代 - 以便他們將來能夠俯首貼耳地接受政權的繼任者。這種政治體系使他們變成野心家，同時或多或少玩世不恭地吸收政權給與他們的東西，這些東西能夠使得老牌的官僚層級制度維持一個平衡並確保其未來。我們可以想像到在這種背景下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今後將會全力支持古巴政府的立法提案，因為它將通過維護他們的利益，急他們所急，想他們所想來確保他們基本滿意。而

那些不加思索，不知不覺加入到這個隊伍裏的人，將不得不隨波逐流，因為他們別無出路。

這些是思想鬥爭最重要的基礎和機制。也許古巴在國際上的一些朋友在對這個計劃提供無條件的支持之前，應該清楚這些反映。

思想鬥爭是古巴政府統治人民的一個機制。我們不認為我們應該毫不批判地接受這種強權的官僚主義和古巴新的管理者，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把政治當作實現他們野心的工具，他們為的是保住他們以千百萬人民的勞動為代價換來的位子和特權。我們也認識到這個國家正試圖以各種手段來贏得人民的支持。

古巴政府正依賴於對人文理想和正義的最基本概念的操縱來實施她的計劃。說白了：每個國家都是這麼幹的。古巴的問題在於國家似乎站在左的立場上做這件事情，反之別的國家就不是。

對許多古巴人來說思想鬥爭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而它靠的是建立一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這是大錯特錯的：如果它是一種反美帝國主義的新形式的話，那它除了國家官僚主義和新的管理者外沒有別的階級目標。根本沒有任何途徑可以創造一種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思維方式；相反它正利用和資本主義相同的統治機制以集權和孤立的國家主義來完善和發展自己。

曼努艾爾帕茲奧特加是一位古巴的知識分子，以筆名寫作，自稱為“自由的社會主義”。

注釋

[1] 本文，“在朋友中間流傳”，寫於菲德爾·卡斯特羅生病並交權給他弟弟勞爾之前。我們在此刊出原稿的一個簡短譯文。

[2] “Emergente”（緊急）這個詞有模稜兩可的意思，容易使人糊塗。一方面，政府用它來指緊急事件，即由於創造一個新社會的革命鬥爭而誕生的一種新的專業人士。但我們通過urgency（緊急）也能理解培養新的專業人員來滿足社會物質醫療和教育這些重要的社會需求，這些都是古巴歷史上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的支柱。

（譯自《國際觀點》總第386期——2007年二月號）

領導人的繼承是連貫性的標誌

吉恩·卡斯提羅

古巴將何去何從？1959 年古巴革命的社會成果能保得住麼？如何堅持一個非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是什麼？

古巴前途未卜的命運對全世界勞工都至關重要，因為一旦古巴發生資本主義復辟，所有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合理性就會長期受到質疑。

毋須斷定最終一定可以得出明確的答案，我們已決定開展關於有可能保衛和發展古巴革命成果的社會現狀及趨勢的辯論。在接下來的幾周裏我們將發表一系列文章，作者包括幾位在古巴很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者。我們的第一篇文章是來自一位定期訪問古巴的法國馬克思主義者：讓·卡斯特羅的報導。我們希望這些文章的發表能夠使辯論深入，辯論將有助於更好地武裝保衛古巴革命勝利果實的人們。

對今天這一代古巴成年人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和匱乏、官僚主義以及自上而下的獨裁主義劃等號的。在這場幾百萬古巴人以社會正義和民族獨立為口號、為之奮鬥了半個多世紀並最終取得勝利的革命以後，我們怎麼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最近 15 年的革命進程是時代的里程碑。隨著蘇聯的解體，古巴人不得不適應失去安全網路庇護的國際環境。這種改變導致了人們行為方式的急劇變化、社會規範的重新改寫以及社會金字塔的倒轉：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又重新出現了色情行業，而當侍者或計程車司機卻比當教師或醫生收入高得多。

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辦法光靠工資謀生。如果不依靠“remesas”（西班牙語：僑

匯）——海外流亡者寄回來的匯款——在一切物資都短缺的境況下，就沒有什麼可供選擇的生存方式。古巴人的“創新，決心，解決”今天變成了“盜竊，腐敗，賄賂” [1]

當革命賴以支撐的價值觀基礎隨著雙重道德 [2] 滲透進古巴社會而被腐蝕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回潮。今天，革命進程還有什麼合理性可言？

在這種背景下，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除了指南針之外起不了別的作用。所以當這位歷史性的領袖讓出權力而沒有徹底地放棄對政務的幹預，為他自己保留了重新幹政的可能性的時候，此時作為沒有判斷力的大部分古巴民眾，決定等待。

今天革命還有什麼群眾基礎？

當你在哈瓦那街頭漫步的時候，只要遠離旅遊者經常出沒的地方，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疲憊、不滿和失望。如果你鬥膽問個問題，回答總是一成不變地重複“哦，這可不容易”或者稍微有活力一點的“這可是鬥爭，同志。” [3] 不過是為了活口而鬥爭，不是為了革命。為了獲得維持普通生活而非奢侈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物資，每一天都是一場真正的戰鬥。很多東西只能用外匯購買，比如油，一公升的價格在 2.10 元到 2.30 元古巴外匯兌換券 [4] 之間變化。而 2006 年夏天，國家雇員的平均工資是一個月 15 元古巴外匯兌換券。

政府瞭解這一情況，但是由於害怕引發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拒絕上調工資。結果大部分古巴人都按照他們民族的古老格言“政府

假裝付了我工資，我就假裝幹了活”謀生。所以我們只能對官方宣佈[5]的 2005 年度經濟增長數字（11.8%）表示驚奇。既然來自正式工作的收入成為象徵性的，古巴人只得“找到了一條”靠其他方式謀生的手段。

這種經濟上的貧困導致了意識形態參照標準的喪失和相當程度的社會規範的改寫。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小學生在試卷上向他的歷史老師解釋說，既然目前很窮，那麼我們一定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而在柏林牆倒塌以前，古巴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那時我們衣食無憂。

由於不能僅僅靠工資滿足家庭的生活需要，古巴人迫不得已上班時間溜出去外面尋找生活必須的資源，或者盜竊貪污他們自己的工廠裏的東西。這些工廠以前曾經是重要的稅收來源。雪茄廠，煉油廠和建築公司的工人每天盜竊他們自己的產品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程度。一個雪茄廠的普通工人估計他 2006 年 6 月從工廠偷走了價值 1500 古巴比索的物資，而國家付給他的月工資大概是 400 古巴比索。工廠的領班和經理們，由於他們的職務之便，偷走的物資肯定要比他要的多得多。

爲了盡力改善這種狀況，政府在思想領域進行了鬥爭。1999 年發起了“思想戰役”，主要目標是用社會主義祖國的集體主義思想，給那些迷失在資本主義和追求成功的個人主義的錯誤道路上的羔羊以力量，使他們迷途知返。

然而，兩個嚴重的錯誤破壞了這場運動：一是沒有面對真正的經濟問題，而這才是讓古巴人對社會主義產生幻滅感的根源，二是運動是由革命退伍軍人發動的，革命軍隊的老幹部並不能勝任對他們身邊的數十萬年輕人進行大規模的持續的動員。只

要物價和收入之間的差距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官僚教條的體制機能沒有得到任何革新，任何政治努力都不可能讓古巴人真的相信存在著一個既不受窮也不受壓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官方、官僚和等級制度的符號。令人擔心的是我們看到，就象在蘇聯一樣，最高層負責人的不正常做法已經使得可能出現這樣一種制度，它的各個方面，從經濟和政治選擇到社會正義目標，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教條和壓制來反對超出它所規定的政治條條框框的一切事物。

今天古巴的年輕人對公共空間的過於政治化（馬路上，媒體上充斥的大量廣告，工作場所和居住場所的強制會議）的回應是對政治的明顯的冷漠。就這一代古巴人而言，當你讓他們從政治上給自己下定義時，他們會說他們可不是形形色色的“菲德爾主義者”。只有對作為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歷史性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尊敬和仰慕，才能解釋這些古巴人為什麼是與官方推行的意識形態，而不是他們所認為的一種制度所應有的“社會主義”觀念，價值和實際“保持一致”。這也是為什麼卡斯特羅不久以後的引退會讓人對社會主義制度還能不能生存下去憂心忡忡的原因。領導層精英非常清楚這一點。他們不停地重複，把權力交給古巴共產黨（PCC）支持的勞爾·卡斯特羅是完全合法的，這種交接是在革命連貫性得到最大程度保證的前提下完成的。

政治危機不被承認時期的政府政策

自從進入開放和封閉的迴圈以後，古巴的體制往往是在最大程度的寬鬆後面緊跟著的就是最嚴厲的壓制。2003 年明顯是新一輪壓制

的開始，首先是在 2003 年初發動了反對非法的兼職運輸業和商業的運動，然後是在當年春天 75 個持不同政見者的入獄。由此我們見證了經濟的再集中化，社會控制機制的就位，這種就位隨著由 28000 個古巴年輕人組成的社會工作者團體的建立而得以鞏固，以及 2005 年開展的反腐敗運動。

在經濟上，對市場的部分開放和允許 150 個行業在一定範圍內自由經營的權利下放已經帶來了問題。實際上，人們可以按照他們自己職業從事自由經營的執照並非一直可以續辦，而且也很少發放新的執照。管制檢查日益頻繁——儘管有時候因為古巴人中間流行共謀交易，換句話說就是利益交換的緣故，人們會質疑檢查的有效性：老闆對下屬的雞鳴狗盜視而不見，而下屬從所得中給老闆留出他的那一份。既然幾乎所有古巴人的收入中都有一部分是非法所得，他們也就沒有興趣告發其他人，因為這樣做很容易引火上身。

經濟繼續按照兩條軌道運行：古巴比索作為國內貨幣可以買到定價很便宜的日用品，而可兌換比索（2004 年底為了支援新比索被撤出流通之前美圓也是可以的）用來進行外匯支付。政府的目標可能是及時把兩種幣制合二為一，用一種新的貨幣取而代之。但是最近的政策並不支援這一目標。現實情況是，伴隨旅遊業和服務業（生物技術，優質醫療服務，歡迎拉丁美洲人尤其是那些來古巴做他們在本國做不起的簡單外科手術的遊客）的優先發展而出現的是古巴社會的地區割斷和社會分裂。

按照當初的預計，留給市場經濟的空間和功能都是作為被古巴國有經濟包圍的飛地。有些大城市郊區的街坊成了接待拉丁美洲客人的新的中心，這些客人等著接受預

約的“妙手神醫”的醫療服務[6]。這些地方被有意識地和別的古巴人居住區分隔開來。一般都遠離城市中心，難以靠公共交通到達。通過同樣的方式旅遊中心一開始就被規劃成飛地，大部分旅遊中心在海邊，這樣一來外國人和古巴人之間的接觸就被嚴格控制在最小範圍。

然而，這些政策並沒有獲得圓滿的成功。越來越多的遊客、學生、記者和商人在城市裏和古巴人交相雜處，尤其是在哈瓦那，那裏才會滋生賣淫、賭博和其他的新興的犯罪。有些古巴的年輕人不再去上班，而是等著“尤馬”，那些能讓他們維持生計的外國人。許多其他年齡的勞動力也一樣：他們離開在公共機構的崗位比如說教師、醫生、律師或者護士去當侍者、計程車司機、博物館或者城市裏的導遊。這些新職業收入更加可觀，因為他們收的是外匯。

為了阻止資深的專業人士毫不猶豫地大批流向古巴經濟的市場化部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府已經出臺了龐大的計畫補救受影響最嚴重的兩個部門：醫療和教育。這就是“maestros emergentes”（“教師培訓緊急計畫”）和“infirmieros emergentes”（“護士培訓緊急計畫”）。“Emergentes”可以翻譯成意外的，但是也可以翻譯成緊急的。國家為了應對極度缺乏教師和護士而面臨的現實緊迫性實行的這些計畫，已經成了沒完沒了的笑話嘲笑的物件。參加計畫的年輕人，只接受了針對他們專業中最實用部分的短期培訓課程，就匆匆忙忙地拿到了文憑，和他們的前任相比無法在業務上達到相同的水平。古巴人對惡化的醫院和學校的公共服務怨聲載道。就象木腿上裹的繃帶一樣，這些計畫因此只能是非常短時期內的應急方案。決不能代替

對現行的國家人力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分佈的真正的質疑。如果人民在等待，能得出的第一印象就是政府和最高行政部門也在坐等，而且不敢實施真正的計畫來革新作為古巴革命的最初目標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為了保衛 50 多年來已經贏得的社會果實，這樣的計畫是必不可少的。

受控制的權力交接

當 2006 年 7 月 31 日晚上，新聞宣佈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病情以及因此要把權力轉交給他的弟弟勞爾的時候，邁阿密的古巴人沖上街頭自發地聚會。在古巴島上，街道上空無一人，肅靜沈默。接下來的幾天裏才有極少數人冒險在辦公室、建築工地或者公共汽車站這樣的公共場合聊起這個話題。被剝奪了獲知他們國家領導人健康的哪怕些微消息，受到在這種情況下加強了幾萬預備役人員的員警、國家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嚴密控制，人民實際上被排除在決定權力移交的政治決策過程之外。

所以古巴人決定等待。有點違反常理地是，在意識形態壓倒性地佔據公共空間的古巴，反而有那麼一些人，我們無法準確的估計有多少，好象對政治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人會去問他們的感受，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對政策選擇產生任何影響。那些以國家的名義做出決定的領導人和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之間是隔絕的。這種政治冷漠帶來的無力感是令人擔心的，因為當資本主義復辟來臨的時候就幾乎不會遇到抵抗了，當年蘇聯解體成為俄羅斯的一幕又會重演。

因為在每一個地方都被召喚，古巴人民也就不在任何地方真正的存在。被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幹部蒙蔽、鼓動和他們的長篇

演說弄得不勝其煩的古巴人民，實際上已經在滿足日常需要的短促戰鬥中疲憊不堪，被撕成了碎片。越來越不願意與領袖在演說中所說的，為了國家的未來必須做出“革命的犧牲”這樣的豪言壯語保持一致了。面對廣泛的不滿，在此微妙和危險的時刻，這個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之間移交權力（按照官方的口徑是暫時的）的時刻，體制和它的最高層代表牢牢地強調連貫性。在卡斯特羅兄弟之間的連貫性，革命範式和價值觀之間的連貫性，由古巴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先鋒的角色所確保的連貫性。

在八月份各地都組織的支援菲德爾的集會上，毫無例外地以激進分子祝願“司令員”早日康復的插曲結束。七月份以來制度上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做了幾十年應聲蟲而不是提出政治動議的機構之後，黨的作用又一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黨的常務秘書處又恢復了職能。公共場所出現的佈告讚揚黨作為革命進程唯一的政治制度繼承人。

因此在 2006 年 7 月 31 日由卡斯特羅的秘書宣讀的文告中，政治連貫性成了由他選定的繼承人當前的政治議程。很明顯，領導人們沒有興趣在這位歷史性的革命領袖仍然在世的時候提出激進改革的打算。在此刻他們從這種脆弱的現狀中獲得支持是很合情合理的。但是目前這種狀態不會持續很久。勞爾·卡斯特羅沒有他的哥哥那樣的個人威信。

在國外他也沒有象他哥哥一樣的政治地位。所以他更難以大膽地面對壓力，不管壓力是來自島上渴望變革——當然是進步的變革，能夠在保留革命的社會成果的同時獲得更多貿易、民權和政治上的自由——的古巴人民，還是來自國際社會和古巴流亡者團體，後者正在推動能夠在古巴最終產生一個西方

模式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變。

當 2006 年 9 月中旬在哈瓦那舉行的不結盟運動高層會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最終無法領導古巴代表團的時候，關於他的健康狀況和將在古巴發生想像中的“轉變”的推測就流傳開了。這位革命的歷史性領袖的地位一定受到了削弱。看上去很難想像他會收回在最高領導層的位置，撤銷儘管只是暫時委任給他的弟弟勞爾的權力。

現在談論古巴的轉變要麼太早要麼太遲。說太遲是因為直到今天，15 年來分析家們都一直認為他們可以看到古巴無須任何根本性變化就會發生“轉變”。說太早是因為你無法用在南美國家政治體制變化和東歐國家從原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向民主的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發生過的政治時間表來衡量古巴的實際情況。

在古巴有一股進步的力量，努力使從蘇聯繼承的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向新型的社會主義制度轉變。這種新的社會主義是既保證民間的、政治的和社會的自由，又保留了以社會正義為目標的真正由人民參與的經濟模式。這股力量是弱小的。在古巴不存在獨立的能夠在公共空間發出和政府不同聲音的商業聯合力量和社會運動。所有的群眾團體[7]無一例外地實際上都是半官方組織，它們的作用更多的是充當最高層方針的傳送帶而不是捍衛其成員的利益。

既然沒有辦法從上層開始改變實際情況，有些成員就試圖從底層革新這些團體的內部機能。另外一些人為了反省作為政治進程的革命，試圖在這些無法避免的結構——應該說所有古巴人都要隸屬於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內部建設新的政治空間。涉及此事的是一些沒有正式組織起來的小團體，我

們其實是在談論一個多少彈性地依賴這個時代的鬆散的網路。

這些團體當然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的古巴現實生活中構成強有力的革新，但是他們正在自己的活動範圍裏為了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而戰鬥，同時也重新佔領自從柏林牆倒塌以後已經被某些領導精英所享受的特權部分徵用的政治空間。正是在這些力量身上，我們看到了可以讓這個島國免於再一次淪為一個香蕉共和國或者經濟上依賴、政治上受制於人、缺少社會正義的美國的附屬國。

（吉恩·卡斯提羅，教師，革命共產主義聯盟（LCR，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成員。他多次去古巴旅行。在文中他描述了古巴現狀給他的印象以及基於耳聞目睹的一些思考。）

注釋

[1] 西班牙諺語：“創新，決心，解決”

[2] 只要官方和公眾沒有矛盾，就能獲得對革命價值觀的支持，但是與此同時革命實踐卻日益背離這些價值觀（偷竊，欺騙，挪用，貪污，等等）

[3] “哦，這可不容易”，“這可是鬥爭，同志。”（西班牙語）

[4] 古巴外匯兌換券是可兌換的古巴比索。1 古巴外匯兌換券=0.85 歐元

[5] 《格拉瑪報》，古巴共產黨的官方新聞機關，2005 年 12 月 22 日

[6] 毫不誇張地，“妙手神醫”，目的是一個簡單的手術就使那些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由於白內障失明的患者恢復視力，而他們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是做不起這種手術的。

[7] 這些團體是：古巴工人聯盟（CTC）；古巴婦女聯合會（FMC）；保衛革命委員會（CDR）；全國小農協會（ANAP）；大學生聯合會（FEU）；中學生聯合會（FEEM）；少先隊（小學生）和共產主義青年聯盟（UYC）

漫長的等待之後……

切·格瓦拉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評論手記

米高·洛維

很久很久，經過漫長的等待，我們終於迎來了這本書的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切·格瓦拉對於蘇聯的政治經濟體系的諸多觀點(1963年西班牙語版)，在前往剛果的任務失敗之後，從1965年到1966年期間，切·格瓦拉住在坦桑尼亞或者布拉格。就在這段日子裏，他寫下了這些筆記，之後他便去了玻利維亞。



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

過去幾十年來，這篇文章始終鮮為人知。直到蘇聯解體之後，古巴政府才允許一些學者對這篇文章進行研究，但是政府不允許他們抄寫筆記。直至如今，在這篇文章面世四十年之後，它才在古巴國內正式發行。在這個版本裏還包涵了一些未曾發行的原文：1965年4月切·格瓦拉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一封信，這封信就是本書的序；一些關於馬克思和列寧的文章的評論；一部分經過篩選的關於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1963年到1965年）和同事們

的談話的評論——格瓦拉寫給幾位名人的信（經濟學家 Paul Sweezy，法國共產主義學者貝特海姆 Charles Bettelheim），這些評論已於70年代以法語版和義大利語版部分發表；埃及期刊《El-Taliah》於1965年4月對格瓦拉的一次採訪的摘錄。

為什麼格瓦拉的這些筆記沒有在當初就被發行呢？在外界看來，我們能夠理解是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前，由於各種政治和外交因素，使得這些筆記被封為機密。但是到了1991年之後，發表這些筆記又有什麼危險的呢？這種長期的掩蓋行為實在令人費解……到底是誰決定將它們一直封存在深處的呢？又是誰最終把它們公諸於世的呢？在本書的開頭，來自哈瓦那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的 Maria del Carmen Ariet Garcia 用格瓦拉自己說過的一句話隱晦地解釋了這一切“這是幾年以來最值得期待的一篇文章”。

如今，這篇有趣的原文終於和讀者們見面了。它見證了格瓦拉的獨立精神，見證了格瓦拉對於蘇維埃形式的社會主義的獨特見解，以及格瓦拉研究看待事物的特立獨行的方法，同時它也展現出了格瓦拉思想的最高境界。

讓我們從切·格瓦拉同志的思想境界說起：首先，我們並不清楚，在1966年到1967年期間，格瓦拉同志的思想覺悟是否有所進步，那時的他還未完全理解斯大林主義

的真諦。他認為是列寧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 60 年代蘇聯的衰落。當然，他認為如果列寧能夠活得再久一些，就能改正那些導致蘇聯退步的錯誤政策——他在筆記中諷刺般地寫道：“列寧的逝世是個錯誤”。然而他也認識到，蘇聯新經濟政策推廣的資本主義元素，導致了蘇聯從 1963 年起走向了衰落，並且使得資本主義萌芽逐步復蘇。格瓦拉對於蘇聯新經濟政策的所有看法都很有趣，部分觀點與 1925 年到 1927 年期間蘇聯的左翼反對派一致：例如，當他提出“黨內核心領導必須與整個社會緊密關聯，組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制度。”我們很想知道，當時格瓦拉是否讀過托洛斯基的著作，雖然在這些筆記中他從來都沒有提到過托洛斯基這個名字。然而格瓦拉很清楚地認識到，布列茲尼夫時期的蘇聯新經濟政策導致了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傾向，這樣的歷史假設是不恰當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在蘇聯經濟、社會以及政策體制中產生的斯大林主義和巨大的思想畸變。在這本手記中很少提到斯大林；而少數的幾句話之一確令人觸目：“斯大林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輕視共產主義教育，並且盲目過度地崇拜權威。”這麼分析雖說正確，但考慮問題也不夠充分。

在與貝特海姆（反對格瓦拉的觀點）和歐尼斯特·曼德爾 Ernest Mandel（同意格瓦拉的觀點）的辯論中，我們已經知道，格瓦拉對於蘇維埃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觀點，與他在 1963 年到 1964 年期間所寫的經濟評論非常相符：支持中央計劃經濟政策，反對所謂“自管”的企業，即自主的遵循市場規律的企業；支持共產主義教育而非個體金融政策。格瓦拉還對那些生產企業領導層的過分物質追求感到擔憂，他認為這就是腐敗的根源。另外格瓦拉還認為，整個蘇聯的商業環境裏缺乏國際主義精神——相互依賴的

各個國家之間到處都存在著不公平的交易。用列寧的一句話道出共產主義的重要性：“我們不能只在一個國家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對此，格瓦拉認為：“雖然有些觀點後來被證明是錯的，但總體來說列寧的觀點清晰地闡述了全球革命的性質。”格瓦拉明確地提到了“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卻沒有提到斯大林主義。

在這些手記當中，並沒有提到托洛茨基，但我們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這與格瓦拉在工業部任職期間與同事們的辯論有關：你絕不能忽視那些在聚會中侃侃而談產生的想法，否則那些各種各樣的想法就不會自由地發展壯大。“很顯然，從托洛茨基思想中，我們可以學到許多東西，即使後來他犯了錯誤。”格瓦拉略帶諷刺地補充道，蘇聯人認為托洛茨基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錯誤，還給他起了個“San Benito”（“地獄服”）的綽號，意思是指他就是個穿著黑袍而不肯悔改的異教徒，一個被西班牙人綁在火刑柱上接受刑審的異教徒。

格瓦拉為堅持建設社會主義進程而盡心盡力，因為他相信“共產主義社會能把人類從貪婪的物欲中解放出來。”在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信中，他還意識到——在古巴，“沒有計劃，工人們就無法進行工作”。那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些計劃呢？從格瓦拉在 1963 年到 1964 年期間的辯論中我們無法得到答案。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 1965 年到 1966 年期間的評論手記中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內容。人民群眾，他寫道，必須一起參與到計劃的制動之中，而計劃的實施則完全是技術上的問題。格瓦拉認為，在蘇聯，制定計劃的想法被強行改成了“符合法規的，為群眾服務的經

（下轉第 3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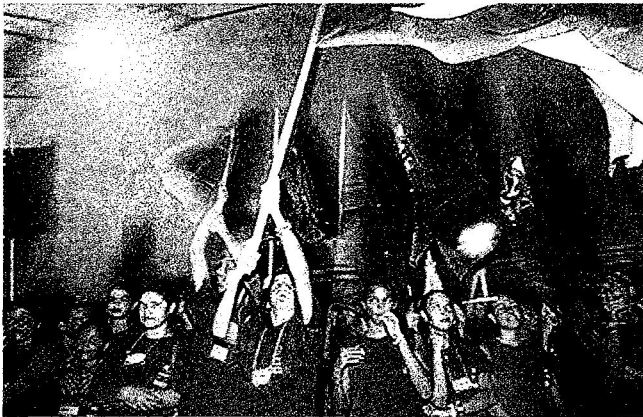
越過菲德爾看古巴現實

(訪談錄)

薩繆爾·法博

十一月二十八日，大衛·馮哥爾從 ATC (Against the Current: “中流砥柱”) 編輯部電話採訪薩繆爾·法博

ATC (《中流砥柱》雜誌編輯部，簡稱 ATC): 就象你說的，你完成的這本書，是關於即將到來的古巴後卡斯楚時代的討論的一部分。我們就要談到它，不過先提一個問題：當美國右翼人士和布希當局認為菲德爾行將就木甚或已經死亡而興奮不已時，你的感覺如何？是不是相當可笑？



古巴共產主義青年

薩繆爾·法博 (簡稱 SF): 實際上那全在意料之中。他們，尤其是右翼古巴流亡者，一直在垂涎可能的資本主義復辟，認為如果沒有卡斯楚，這個願望更易實現。更為有趣的是隨之而來的美國政府裏各種“過渡時期”計畫

和委任狀，以及右翼古巴經濟家討論他們將在古巴要做的事。

ATC: 我稱之為“貪婪性”的姿態。

SF: 對。在邁阿密街上有那些人鳴叫喇叭的可笑景象。那並不重要，問題是由美國古巴人骨幹和美國同夥推進美國政府委任狀的事。他們並不真正關心建設一個右翼群眾運動---那不是 2006 年的事。流亡者的關注焦點是在邁阿密弄錢。當然，右翼流亡組織會竭力塑造古巴過渡時期

ATC: 你是指最近一直大力鼓吹的為大規模私有化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所作的全美推銷戰略？

SF: 在美國沒有軍事佔據 (不可能) 古巴的情形下，那顯然像是發夢。但考慮到在墨西哥灣這邊的人可能聯合在古巴的同夥，尤其今日古巴政府裏暗藏的新自由派和“過渡時期”時可能浮顯的人，情況就不同了。這樣的聯盟可能創建一個新的政治版圖，那是美國政府間在幾乎 50 年推翻古巴政府的嘗試中從未有過的。

幾周以前 (2006 年 11 月 15 日)《華爾街日報》有篇文章，說到幾個古巴流亡經濟學家業餘時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供職，引用了其中一人俄尼斯圖·賀南得·卡塔的話，說他很樂意象一個“古巴的鄧”那樣去作為，指的當然是鄧小平的中國資本主義計畫。

ATC：換言之，民主和政治自由上並沒有多少可做的。

SF：當然沒有。他們的底線是轉向資本主義和市場。

Rewriting History? 重寫歷史？

ATC：你書中有關古巴革命的論據從哪里引進的？

SF：我的書只針對過渡時期的一個方面，即政治和意識形態。考慮古巴的過渡時期，對革命的解釋將涉及歷史的重寫。

在俄羅斯，一直上溯至 1917 年革命本身，那裏總有俄羅斯共產主義的關鍵人物。蘇聯坍塌時，這點變得非常強勁，歷史的重寫成了流行風氣。我則不會去勉為其難地竭力主張古巴會有類似的努力。

例如，有爭論說，1959 年以前古巴經濟發展充分並不需要革命；或者說，同美國的衝突可以談判解決。[法博在“古巴革命起源的再思考”中論說：衝突並不是因為誤解或共產主義偏執妄想症，而是植根於拉丁美洲美國帝國主義結構。---編者]

這個觀點（協商）是古巴革命後首任美國駐古巴大使菲力浦·邦薩極力主張的。他實際上是從玻利維亞的拉巴斯到哈瓦拉的，曾經成功地幫助接納 1950 年的玻利維亞革命。

邦薩是一個圓滑可敬的職業外交官。他的整個方法是準確地同古巴革命政府的右翼達成協議，這個右翼確實存在，儘管它不如玻利維亞的強。所以我預期在古巴的一個過渡時期，許多歷史會重寫，我書裏的分析或許有助於那些將試圖建構另一種革命和民主的人們。

ATC：“另一種革命和民主”是什麼意思？

SF：實際上古巴施行的是蘇聯式的體系：一黨專政，勞動者不能監督控制它，沒有組織工會或其他例如黑人和婦女組織的自由，也沒有言論自由和其他的民主成果。

後共產主義過渡時期這一模型是把資本主義引入這個非民主機制的導管。這是我所能見到的唯一一條把資本主義引入古巴的路，無論它是中國完全的獨裁形式或是俄羅斯風格，也即帶有某些化妝的民主飾物卻沒有什麼民主實質的方式。它會取某種抑止工會和政治權利的獨裁形式。

“另一種革命和民主”意味著古巴人民自下面組織起來，先保護自己，然後以此為基礎，把古巴重塑成集體而民主的社會。我很清楚這種革命和民主的構築要素在現在的古巴並不強大。但我希望對這場鬥爭有所貢獻，說服人民看到這是過渡情形下唯一真正進步的行路方式。

ATC：對這本書和你的分析，你得到了些什麼反映？

SF：這本書問世九個月了。除了在幾份社會主義雜誌（多數屬於我們的左翼反史達林派），在一般的媒體上它完全沒有被提到或談論。唯一的例外是我得到機會在 CSPAN 的書評頻道對它做完整介紹。那是一個全國廣播，重複播了幾次。至於學術雜誌方面，它們運行週期長得多，現在說還早了些。但我希望那兒會有我們左翼角落以外的回音。

ATC：你書中用了一個未加說明的術語“elective affinity”（選擇親和力），在

卡斯楚的早期人民黨領袖戰略和他最終採用的蘇聯模式共產主義之間的吸引力上你用了這個術語。你能稍微談一談它嗎？

SF：對。我應向非社會科學領域的聽眾解釋這個術語。選舉親和力指能一起共處的來源不同，並且最終可能聯結起來的力量和人們的內在相互的吸引。它可能比真實的情況看起來更深廣。我是從馬克思·韋伯[19世紀德國社會學之父一編者]引來的，韋伯則取自哥德[德國古典詩人和劇作家]。

對概念的區分可以有相容性領域，它有利於人從一個概念轉到下一個。韋伯多次使用該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17世紀英格蘭清教徒倫理和興升的資本主義商業實踐之間的“選擇親和力”。]

What's After Fidel? 菲德爾之後如何？

ATC：讓我們回來討論實際的古巴形式。你是怎樣看待菲德爾·卡斯楚的情況？從古巴領導層在這個不確定時期的作為你看到了什麼？

SF：首先，我不去推測菲德爾·卡斯楚的身體問題，沉重的經驗讓我懂得了不要議論你毫不知情的事情。但這個週末會有一個早期測試：格藍馬登陸[1]50周年和他遲到的80歲生日紀念。

如果他沒有露面，那就可能意味著他的情況惡化，或者生命垂危，或者比上一次露面更差。他說過他已失去了40磅體重。[2]

此時此刻情況非常難定，因為菲德爾既不在位又未出局。他把國家的管理交給勞爾·卡斯楚，卻又接受訪客和電話。所以只要兄長還在，勞爾任何離

開菲德爾戰略的計畫都不可能實施。

接下來的日子直到7月31日，國家處於高警戒狀態。幾個部長被解職了，那對勞爾不一定有幫助，眼下確實沒有消息。

不過，有不少跡象顯示勞爾·卡斯楚完全支持中國道路。2005年4月訪問上海時，勞爾說：有人疑慮中國模式，我不，今日中國證明瞭另外的世界是可能的。

我發現這個評論是醜惡的，即挪用西雅圖全球正義運動的聲明口號推銷中國模式。不單是聲明，勞爾緊控的古巴軍隊作為包括旅遊業在內的聯合企業裏的一個大玩家而起作用。

你有一些軍官是穿制服的商人，通過古巴武裝力量深深捲入與國際資本主義的交易中。軍方已牽涉到他們稱之為“企業改進”，也就是所謂的與中國模式經濟實驗一致的體制效率裏。

只要菲德爾活著，勞爾就寸步難移。問題是，在古巴支持和反對這個方向的勢力有哪些？我相信那些勢力存在於萌芽時期。因此同華盛頓和邁阿密的整個關係將會同那種“黨派”的出現而糾纏一起。

ATC：簡而言之，你看到了來於現行體制---尤其是軍方而非現存小企業---的這類資本主義的動力？

SF：古巴的小企業這一塊自1990年的鬆動後大為萎縮。它從未那麼重要，它曾經達到150,000人持照運營獨立小企業（如美容所，被稱為“paladares”的家庭小餐館）的規模，不過現在少了。

我認為[走向權威資本主義的動力]

來自於軍隊和投身于資本主義聯合冒險的平民。把勞爾·卡斯楚 2005 年 4 月的上海講話（前面引用的）同菲德爾·卡斯楚接受西班牙出生的“外交世界”雜誌編輯伊格那西奧·拉芒那特的訪問談話比較一下，是很有趣的。談到中國時，菲德爾的回答純粹是回避。

政治上，菲德爾當然不會公開批評中國，但他肯定不會讚美它。因此在古巴統治階層內部對於中國模式顯然意見分歧。但針對未來的趨勢，沒有人能預言由內部和外部勢力組合而引發的事件。

政治機構裏會有人抵制這些變化，他們被稱為“塔里班份子”（也即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份子）；如外交部長菲力浦·佩若·若克，他曾是菲德爾·卡斯楚主要幕僚，在其前任有麻煩時他成了外交部長。他年輕，才四十來歲。

不過要清醒，所有這一切都含有推測的成分。

ATC：一個可能相關的題目---儘管我還不能真正說它們互相有關---色利阿·哈特的一些近作由於特別參考了托洛茨基而吸引了左翼的注意。你認為她的文章是其內部關於古巴未來爭論的一部分嗎，應當如何理解它呢？

SF：首先，色利阿·哈特·桑塔馬利亞的文章完全是為外國左派寫的。很少古巴人知道它。撇開這點不談，她的“托洛茨基主義”比較奇怪，全不談及勞動者的民主。她的“托洛茨基主義”崇拜菲德爾·卡斯楚，談革命擴張而不談革命中的民主。

她的文章裏沒有 1933 年後的托洛茨基，那以後的托洛茨基強調勞動者

民主的重要性，並離開一黨專政的理論。我傾向於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減去勞動者民主就非常非常接近第三時期左傾史達林主義。換言之，她用一條更軍事化的史達林主義基線同大眾陣線作對照。

色利阿·哈特顯然反對古巴的任何資本主義演變。所以她會站在現存統治階層裏強硬派的一邊。她不點名地談論古巴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在古巴還有另一組不太為人知的有趣的人，他們的父母不如色利阿·哈特有名（黑狄·桑塔瑪利亞和阿曼多·哈特），卻更認真地對待托洛茨基，在學術界知識界流行的如“特馬思”一類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在古巴你可以弄到一些已經能發表重要意見，而又不碰到有如菲德爾·卡斯楚和一黨專政這樣一些有如（印度）神牛的雜誌。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作家如阿裏爾·達卡爾，寫了一些關於托洛茨基的東西，並不談及古巴。頗為諷刺的是：他們可以大談蘇聯的崩潰，可以聯繫起托洛茨基，官僚主義和民主替換物來發議論。但你可以說他們實際上寫的是古巴，儘管他們沒有提到它。矛盾的是，那表明他們是認真的，同我們的民主革命觀點有相當關係的。

（卡斯楚就是菲德爾·卡斯特羅）

此文譯自最近一期“中流砥柱”---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的雜誌，見網址：<http://www.solidarity-us.org/atc>

薩繆爾·法博著有：“古巴革命起源的再思考”

NOTES

[1] the beginning of the guerilla struggle in Cuba - ed.

[2] The day following this interview, Cuban media announced that Fidel Castro would not be attending the celebrations - ed.

[3] perfeccionamiento empresarial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下）

彭述之遺作

〔編者按：此文是作者彭述之 1920 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的第二部份，在最近才找到。第一部份曾經以《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為題，首刊於《十月評論》總第 46 期（1980 年 6 月 20 日出版），並收集在《彭述之選集》（第一卷）內。此文題目包括第一、二部份；寫於 1964 年 4 月，是很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故予以發表。〕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一經成立，爲了徵集和培養共產主義的青年幹部，它於 1920 年 7—8 月間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小組織，這個組織差不多是從以前上海“工讀互助團”解散後留下的份子組成的<1>。由於這個青年團小組的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才有可能在實際上從事工人運動，即派遣青年團團員去接近工人，調查工人的生活情況，和個別的工人談話“作朋友”，這便爲往後上海的工人運動、組織工會開闢了道路。

差不多和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爲了喚起工人群眾，使其覺悟他們自己的利益，爲他們自身的解放而奮鬥，於 1920 年 8 月 15 日出版了一個專門刊物，名爲《勞動界》（周刊），這不僅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刊物，也是中國勞動運動史上真正爲工人階級利益說話的第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對於有關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從勞動者創造一切社會生活的物質資料；勞動的價值、價格和剩餘價值；

以及由此產生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不可避免的滅亡，直到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都給了最通俗的一個普通工人能夠懂得的解釋，並以俄國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中取得勝利，建立了“勞農政府”的實例來證明，這便喚起了和鼓舞了工人中先進份子的嚮往和信心。

此外，《勞動界》並登載了關於中國工人，特別是上海工人受剝削和被壓迫的實際情形的許多報導（這些報導多數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在工人中調查的結果），以及工人爲改善生活條件而鬥爭（如罷工等）的事實記錄，同時又介紹了戰後歐美和日本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情形，以資效法和鼓勵。

由於《勞動界》在工人中的散佈和宣傳，很快就得到工人的響應，例如在它的第七期（1920 年 9 月 26 日出版）便登載一個工人名叫李中（上海海軍造船廠工人）的投稿，標題爲“一個工人的宣言”，這個宣言說：

“工人的運動，就是比黃河水還厲害還迅速的一種潮流，將來的社會，要使他變個工人的社會；將來的中國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中國；將來的世界，要使他變個工人的世界。……我可親愛的工人呀！俄國已經是工人的俄國，……這個潮流快要到中國來了，我們工人就是這個潮流的主人翁。這個潮流的主人翁就要產生工人的中國，但是不貫徹聯絡，就會沒有力量。”

所以李中向工人群眾發出呼籲：

“我們少數同聲同類的工人，再聯絡多數同聲同類的工人，成一個大團體，由我們的大團體聯絡其他大團體，以成中國的大團體，由中國的大團體，再聯絡他國的大團體，以成世界大團體。世界團體呀！中國團體呀！我們團體呀！發端就在我們少數工人哪！”

李中的“宣言”不僅是《勞動界》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有力回聲，而且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嚮往，對於它的前途的信念，以及要求自身團結的一種明白的宣告，而且事實上，李中在《勞動界》發表他的宣言之後，很快就受到一些工人的支持，首先在他所工作的海軍船廠裏得到一部份工人同意發起工會組織，經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協助和指導，李中又聯絡了電燈廠，厚生鐵廠和幾家紗廠的機器間的工人，於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機器工會，雖然這個工會所包括的會員只有三百七十人，但它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主義者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自己組織起來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後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1920年12月），人數在一千以上。此外，並著手組織紡織工人，雖然這一工作，由於從事工人運動的人很少，尤其在那些作工人運動的幹部離開上海而去莫斯科學習以後，組織工人方面便停下來了。

爲了聯絡各方面的工人活動份子，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又組織了“上海工人遊藝會”，它的第一次會議，也就是成立的會議，於1920年12月中在復旦大學舉行，到會的工人將近三百人，我們外國語的學生也參加這次會議，由李啓漢作主席，陳爲人任記錄。李在他的會議開幕詞中說：“我們各人從前是苦著餓著；我們想要免除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興興聯合起

來，討論辦法；我們不獨得到這樣的遊藝會而已；甚麼金錢萬能，我們都要改革打破！”。此外，還有楊明齋和幾個工人演說（陳爲人的記錄登載於1920年12月26日出版的《勞動界》20期）。後來並計劃成立一個“勞動俱樂部”，作爲工人經常集聚之所，這個俱樂部的章程已發表於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勞動界》23期，但也由於留俄學生的出國而停頓了。

自留俄學生出國，外國語學校也解散了，留在上海繼續作工人運動的只有李啓漢，他一個人當然不能發展工人運動，他所能作的是把已有的工人組織，如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等繼續保存，這便是1921年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處成立後，在上海從事勞動運動的基礎。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爲了加強對外的社會主義宣傳，決定把《新青年》逐漸轉變爲它的機關報，因而從它的第九卷第一期起開始改變它的內容，即比較明白地和肯定地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方面，並特闢一個“俄羅斯研究”專欄，登載那時可能得到的材料，使一般傾向社會主義分子有可能去了解蘇俄的真實情形，以此加強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心。

陳獨秀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一號發表的“談政治”一文，不但表示陳本人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主張（他自稱是“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同時也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政治方針的公開宣佈。在這篇文章中，陳一方面批評了當時不同政治或反對從事政治運動的幾種傾向，特別是較爲詳細地分析和批評了無政府主義者一般地“反對政治、反對法律、反對國家、反對強權”的論據；他認爲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是消極的，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所歡迎的，因爲“從事實上說起來，……世界各國裏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

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勤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後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於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鬥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會的學說，是階級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所歡迎的，不是勞動階級要國家政權法律，是勞動階級不要國家政權法律。”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國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數千年或數百年底基礎，站在優勝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勞動階級高明得多；勞動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難，征服後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致死灰復燃更是不易。這時候利用政治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陰謀活動；利用法律的強權，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奪，矯正他們的習慣、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這時候若反對強權的壓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會，便不啻對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詔；因為他們隨時得著自由，隨時就要恢復原有的勢力地位。所以各國共和革命後，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壓服舊黨底強力，馬上便有復辟底運動。此時俄羅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寧的勞動專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復勢力，連帝政復興也必不免。”

（底下是駁克魯巴特金的“國家論”。）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類本性的確有很惡的部份，決不單是改造社會制度可以根本剷除的；就是社會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勞動制度——所造成的人類第二惡性，也不是制度改變了這惡性馬上就跟著消滅的。工銀勞動制度實在不應該保存，但同時若不強迫勞動，這時候從前不勞動的人，自然不會忽然高興去做工；從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勞動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從前疲勞底反動，一定會懶惰下來；如此一時社會上的工作效率必然銳減。……”

“據以上的理論和事實討論起來，無政府黨所咀咒的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也應該咀咒的；但是勞動階級據以剷除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應該咀咒的；若是咀咒他，到算是資產階級底朋友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

評修正主義派，即德、法、英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機會主義派。陳評修正主義派說：

“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動，不主張革那資產階級據以造作罪惡的國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義，取競爭選舉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府、國會，想利用資產階級據以作惡的政治、法律來施行社會主義的政策；結果不但主義不能施行，而且和資產階級同化了，還要施行壓迫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當局那個不是如此？像這樣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當做前車之鑑。……”

“他們反對馬格斯〔即馬克思，下同〕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

馬格思曾說過：勞動者和資產階級戰鬥的時候，迫於情勢，自己不能不組成一個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佔領權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權力去破壞舊的生產方法；但是同時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見《共產黨宣言》第二章之末）”。

“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勞動階級底特權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卻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權是怎樣。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倒成了資產階級的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的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的社會主義’，殊不知 Bebel 死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陳獨秀的“結論”是：

（一）“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紀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

性”。“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二）“對於時局的我見”（載《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提出：

“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歡喜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一國民間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的存在。”

（三）國家、權力、法律這三樣本是異名同實。無論何時代的法律，都是一階級一黨派的權力造成國家的意志所表現。我們雖然應該承認他的威權，但未可把他看做神聖；因為他不是永遠的真理，也不是全國民總意底表現，他的存廢是自然跟著一階級一黨派能夠造成國家的權力而變化的。換句話說，法律是強權的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得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四）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

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後者勝利時，馬上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對於他們的要求，除出版結社兩大自由及工廠勞動保護的立法外，別無希望。因為吾黨雖不像無政府黨絕對否認政治的組織，也決不屑學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利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機關和權力作政治活動。”

（五）陳獨秀在《國慶紀念底價值》（刊於《新青年》8卷3號，1920年11月1日）中指出：“全國底教育、輿論、選舉都操在少數的資本家手裏，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份的。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共和政治為少數資產階級所把持，無論那國都是一樣，要用他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現在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與幸福了。社會主義要起來代替共和政治，也和當年共和政治起來代替封建制度一樣，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

“……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現在雖說是共和失敗了，封建制度恢復了勢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趨，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但有人以為由封建而社會主義，中國還必須經過共和時代，所以眼前還是政治問題要緊；又有人以為中國封建式的武人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經濟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緊，還不須經濟革命；我看這兩種話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會主義雖是一定的軌道，然這軌道卻不能夠說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現在的東方各國卻和他們〔指西方各國〕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

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至於說中國只須政治革命不必經濟革命，我便有七個疑問：……（六）中國除了勞動界有了階級的覺悟，組織強大的革命團體，絕對打破資本家生產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國的經濟的侵略，進而為政治的侵略？（七）單是政治革命，能否解決官、匪、政客、游民過多的問題？我不但不反對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實現；但我斷然不能迷信他能夠將中國從危險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說中國此時只須政治革命不須經濟革命，我便要請他解答上面的七個疑問。”

註釋：

<1>1919年末和1920年初，在北京曾發生一種所謂“工學主義”或“半工半讀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的“理想”是“打破勞心勞力的界限：使社會上勞力的人都去唸書——要求高深的學問；唸書的人去作勞力的工。”這樣，便可以“破除職業的階級與奴隸的制度”（見當時散發頗廣的《工學旨趣書》），起初由北京高等師範一部份學生成立“工學會”，跟著，北京大學的學生組織“北京工讀互助團”，隨後，上海亦成立了同樣的組織，這些工讀互助團都是靠捐款開辦食堂、石印、洗衣等來維持團員的生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也曾經在《新青年》雜誌署名登廣告，號召捐款幫助互助團）。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王光圻，無政府主義的領袖之一，認為這是“新社會的胎兒，是實現我們理想的第一步”。但由於捐款的耗竭，這些工讀互助團的存在不過幾個月便自行解散了，這給無政府主義的空想一個實際的教訓，所以工讀互助團中最好的份子後來都轉到社會主義青年團。

曾猛其人（上）

石 隆

本文資料來源：一、曾猛當年先後對我講過的話（文中所記都是我記得準確的）；二、我親身的經歷。本文引號裏的話並不都是當時所講的原話，歷時已久，只能說是大意，但和原意決無出入。

本文只記述事實，不加評論。

石隆

1992年2月

一、 家庭

曾猛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故字仲略，小名阿沼。生於1904年，溫州市人。老家住在麻行僧街。父親曾丹仙，在福州南台當過一任小官吏，卸任歸來，當選過永嘉縣議會議員。他不喜歡多發言，他說：任你口才多麼了不起，即使口若懸河，但抵不上我的屁股——我不起立表示贊成，你講得再好也沒有用。這話足以說明他父親的個性。

曾猛同母兄弟四人。長兄曾亮，字伯明，法政學堂畢業。曾掛牌從事律師業務，但他從未出過庭。因此他人有兩句順口溜：“律師曾伯明，永遠不出庭”。他愛好舊文學，有文才，詩及楹聯，都寫得很好。他討厭廁身官場，又鄙視市儈；終日以吟詠及杯中物自娛。他曾以“荷鍤劉伶”自況。曾丹仙目睹他“不求上進”，極為失望。老三早卒，聽說是紈褲子弟。老四季豪，小名新姆，是錢莊職員，曾猛還有後母生的妹妹一人，弟弟二人。

曾猛在舊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現溫一中的前身）讀書，成績不錯。父親望子成龍心切，而其他的兒子都辜負了他。看見曾猛讀書用功，所以對曾猛抱有莫大希望。但當1919

年五四運動一起來，曾猛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成為十中學生會的領導人，在鬥爭奸商、緝拿漏海、鼓動罷課罷市、反對道尹黃慶瀾等運動中，他都挺身沖在前列。黃慶瀾要逮捕他，幸有他父親的朋友及時通風報信，他逃離溫州去上海。十中開除他的學籍，後來他去廣州參加革命。

在1926—1927年年度交接時，曾猛回家過一次。給家裏留下一張身穿國民革命軍軍裝的照片。他父親把它掛在客廳裏，指望他從此平步青雲，光宗耀祖。但轉眼間，“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父親才知道他是共產黨，只好把掛在客廳裏照片又收起來，父親唯一的指望又落了空。

曾猛在1925—27年大革命以前，經家庭的舊式婚約和陳育芳結婚，生過一女一子，女名為巧秋，子名為曉白。1930年，陳育芳到上海找到曾猛的朋友李景芳，要李景芳轉告曾猛，要求離婚，並提出：子女歸她養育，要曾猛付養育費等條件。當時曾猛還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不能出來公開談判。只好委託李景芳轉達：同意離婚，家中用具全部歸她，子女由她養育，養育費應該付。但身處於地下，無收入，無力承擔這筆養育費，請她諒解。他當時是為付不出這筆養育費，

心裏正在感到不安，恰在這時，何止爭（即何葆貞）譯好高爾基的《母親》由鬱達夫介紹，列入西洋大學名著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拿到稿費二百銀元，何即拿出一百元轉交給曾猛離婚的妻子，作養育費。

曾猛和育芳離婚後，和黃秋君相愛。秋君是育芳的表姐妹。由於他處於地下，又擔任秘書技術工作，無法公開結婚。直到1930年被開除出黨，才和秋君同居。但開除出黨後，社會上還認為他是共產黨人，國民黨還是要逮捕他。他無法在社會上謀生，生活困難，他當時給我的信中用“牛衣對泣”這個成語說明他們夫婦的貧困。到中國托派統一大會後，陳獨秀要他住機關，負責秘密技術工作，才使他的生活有了著落。1932年秋君生下長子，但養育仍有困難，準備把嬰兒送給別人。朋友們都不贊成，結果決定由秋君帶嬰兒回鄉下，交外婆養育。秋君從鄉下回來，曾猛已同陳獨秀一起被捕了。

約在1933年秋，曾猛從南京國民黨獄中出來，回到溫州，住在麻行僧街老家。他既沒有為老家門楣增添光彩，父親和他的關係惡化。就可想而知，他無法再在老家住下去。稍後曾家的一個老幫工叫阿潘的，幫他在蓮花心山上蓋了間茅頂屋子，他夫婦和孩子三口就在茅頂屋子裏住了下來。

阿潘是蓮花心農民，王屏周擔任中共永嘉縣委書記時，執行秋白路線，舉行暴動，王指示蓮花心的起義農民夜裏在山頭瞭望，等候城裏的信號，沖下山來，但那次暴動計畫失敗，蓮花心的起義農民因而沒有下山，未遭摧殘。

曾猛在茅頂屋子的正門，自撰對聯“竹舍茅簷，僅堪遮風避雨；高山遠水，未必曠目蕩胸”。邊門的門聯，集諸葛亮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室內書架上擺有《諸葛亮集》，陳素農著《大軍統帥學》，陳立夫著《唯生論》，當然，還有一些社會科學譯著書籍。

1937年春節，陳素農上山看望曾猛。曾父非常高興陪陳上山。曾父看正門對聯，對陳說：竹舍茅簷僅堪遮風避雨；高山遠水未必曠目盜胸。陳不以為然。陳指邊門的聯要曾父看。曾父看了，說：“諸葛亮終究出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陳說：“人各有志，未可強求”。

陳素農的話使曾父消除了對兒子的不滿，父子關係有了改善，父親把收起來的那幅曾猛的照片，又掛在客廳裏。

秋君和曾猛結婚後共生三男四女。

二、 在廣州

因道尹黃慶翔要逮捕曾猛，他逃離溫州到上海後，他父親為他在溫州闖禍，狠狠責備他，但仍希望他老老實實在上海繼續升學。上海的舊制中學，除國文外，其他各科都用英文原版的教科書。為了升學，他只好先進英文補習學校。他學不進英文，一心想到廣州參加革命。他的十中同學，跟他在反帝愛國運動中結成戰鬥友誼的，如李聖恩、李超麟及孫道濟等都已考進培養革命思想的上海大學。但他要進黃埔軍校，其原因，除廣州是當時中國的革命搖籃外，還因為那裏有非常關懷他的戴立夫在黃埔軍校任管理處處長。

立夫先生是曾猛之父執。他非常敬重立夫先生，一生師事之。他給立夫先生寫信，開頭總是“立師座右”。1925年五卅鬥爭不久，他決定到廣州去。他想進黃埔軍校第二期，但到達廣州時，黃埔軍校該期的招生工作早已完畢。該期新生已經入學。立夫先生就把他留在身邊。稍後，立夫先生認為應該送他到部隊中去鍛煉。征得他的同意後，立夫先生親自送他到何應欽部隊當兵。過了幾個月，立夫先生聽到何應欽的部隊對士兵常行體罰。立夫先生反對體罰，不放心，又把他要回來，安排他在身邊工作。

立夫先生請周恩來及黃埔軍校裏其他共產黨員教導曾猛。並且隨時要他去聽蕭楚女、張太雷等的演講，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因此結識並追隨這些第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活動家，受他們的影響，接受共產主義思想。不久，隨同鄧中夏在職工中活動。他後來在托派活動中能用通俗語言鼓動工人，組織工人進行鬥爭，都是從鄧中夏那裏學來的。他當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介紹人之一就是鄧中夏。（另一介紹人據曾猛的儿子說是“李森”。他說看過曾猛的自傳底稿，我擔心他的記憶有誤。為此問九十老人鄭超麟。鄭說：“一直認為是周恩來介紹的，想不到是鄧中夏介紹，…“李森”（就是李啓漢，他是做工人運動的，五卅前後由上海調廣州。我知道李啓漢在廣州改了名…似乎也是一個字…他和鄧二人介紹曾猛入黨是可能的。”（我把鄭超麟的話一併附記於此，以待證實。）他在工人運動中，結識陳延年、蘇兆征及劉華，當然也受他們的影響。當時，省港大罷工，就是鄧、陳、蘇領導的。1926年6月27日省港大罷工委員會在廣州創辦勞動學院，鄧中夏任院長。曾猛沒有對我說過進勞動學院學習。這可能是同年7月9日國

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曾猛要隨同周恩來，準備出發了。

關於曾猛入黨的確切日期，讀過他的自傳底稿的家屬都記憶不起了（查閱《陳獨秀被捕資料彙編》中關於庭審的記錄，曾猛自供“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黨”，但無日月。）

曾猛自幼練過書法，1926年年尾，他回溫州為我家寫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對聯。懂書法的老先生都稱讚字有功力，頗具風姿。在職工運動中，他書寫大幅遊行標語，曾大獻身手。後來他看到當時的油印檔，質量不高，他又自告奮勇，毛遂自薦。他心細，善動腦筋，由他刻印出來的檔，清晰悅目，使廣州黨的領導們大加贊許。這為他調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準備了條件。

受曾猛影響去廣州參加革命的，先他去的有陳素農（黃埔第三期），後曾猛去的有王屏周、胡長庚等。廣州準備北伐，需要大批醫務人員。王、胡都是醫生，也都是在溫州反帝愛國學生運動中和他結成戰鬥友誼的。除王、胡外，還有藝文中學畢業後學醫的王祥齡。北伐軍出發，他們都是隨軍的軍醫官，屏周和祥齡是衛生隊隊長。他倆又動員黃琮和朱漢章等在他們的衛生隊裏當軍醫。

立夫先生為曾猛在廣州的表現得到領導贊許，深感欣慰。他對因曾猛的影響而來投身革命的青年，象對曾猛一樣喜愛。舉一個例：據曾猛說，王屏周到廣州見立夫先生時，立夫先生平時不吸煙，他老人家親自搬了幾隻箱子，從壓在下麵的箱子裏，拿出聽頭“白金龍”香煙款待屏周，這樣殷勤的招待可以

說明他老人家對投身革命的家鄉青年的歡迎態度。

三、 中共中央秘書處幹事

曾猛刻印的檔，在廣州得到廣東區委陳延年的讚賞。組織要他鑽研這項秘密技術工作，中央需要這樣的人員。廣東區委就把他送去隨同周恩來出發北上，在上海第二次和第三次暴動期間，在總工會工作。第三次暴動勝利後，到中央秘書處任幹事。

據鄭超麟回憶：曾猛在1926年從廣州到上海後，在進中央秘書處任幹事之前，曾在中央辦的印刷所做校對工作。那個印刷所歸鄭領導（史唐也是那個印刷所時排字工人），後來曾猛調中央秘書處，是在王若飛領導下工作的。王對曾的工作要求相當嚴格，曾猛都能接王的嚴格要求，密切配合。鄭說有一次有事到秘書處去，那房子是三層，王住二層，三樓就是秘密技術工作的地方，鄭到三樓看見曾猛正在刻蠟紙，何止爭在油印，工作緊張，沒有跟他們談話。

刻蠟紙，他能在蠟紙的每一小格裏刻四個字。他用筆均勻，字裏行間，整齊劃一。為增加每張蠟紙印出的份數，他不用膠輥印，而把油墨塗在玻璃板上，然後把刻寫好的蠟紙複蓋在上面，用軟布在蠟紙背面均勻輕抹，這樣印出來的檔，字字清晰，加上字體漂亮，看過的人都嘆服不止，要刻出這樣小的字，他得經常自磨，甚至自製筆尖，要親自去選購日本產的紋路最細的刻板。

他擔任秘書處工作後，又鑽研密寫工作，文件的偽裝工作。他用米湯把文件寫在小說的空頁上、書頁邊、上下的空白處、寫在字帖的夾層紙上，甚至寫在汗衫及白色被罩上，不但沒有漏字、錯字，而且用碘酒顯現後，字字清晰。

中央秘書處機關偽裝成上流社會的公館派頭，人員不僅要穿著講究，而且派頭也要象上流社會中人。為應付環境、舉止談吐，都得受到嚴格訓練，不能在行止態度方面，露出一絲破綻。長期的機關生活，使曾猛養成坐必端正的習慣。即使在後來，他看見我坐不象樣時，就馬上糾正。我們認為這是封建社會的一套。他嚴正說：“不是，這是革命的需要，是秘密機關紀律的需要。我是在長期機關生活中鍛煉出來的。”不但談吐舉止，甚至放在箱子裏的衣服都要自己折疊得非常整齊，一絲不苟。我問：這幹什麼？他說：“既然是公館，當然有傭人幹這一行，我們當然不能讓偽裝傭人的同志真的做傭人工作。”機關搬遷時，馬路上可能遇上巡捕“抄靶子”，搜查行李，或者，萬一巡捕房來搜查，總之，以防萬一，不露馬腳。箱子裏冬天有皮袍，夏天有羅衫，都各有摺法。

在長期機關生活中，他接觸最多的是周恩來，其次是王若飛。他的秘密活動技巧、應變的鎮定、平時的警惕，都是他們，特別是周恩來一手教導的，他對周的敬畏，在我們後來的相處中，仍然時有流露。

1927年2月20日——24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軍委書記，同年3月21日——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領導起義的特委有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汪壽華等八人。周負責軍事。曾猛說：“上海第三次暴動時，我在機關裏實在按耐不住，要見識見識暴動的壯麗場面，再三要求出去，才得到批准。隨同陳獨秀、汪壽華…到閘北去了一趟，但不是激烈戰鬥的場面，而是畢思澄已被打跨，武裝工人暴動後震奮人心的勝利場面。”他說：“汪壽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是遭到杜月笙誘殺的。”

（未完待續）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17th Congress of the CCP

Zhang Kai

The 17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dopted the Report made by Hu Jintao. The 30,000-word report was full of nice cliché, and the new catch-phrase of Hu Jintao – the stress on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as written into the Party Constitution, to be parallel to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Marxism, Maoism, Dengism, and Jiang Zemin’s “idea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While the Report admits that China “is and will for a long time remain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 stresse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or social harmony, and vice versa. Even if we do not contest it with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lass struggle in human history, we will see that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accelerating today on China’s reversion to capitalism. The Report acknowledges that China’s productivity level is not high, structural problems exist, the widening income gaps are not improving,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ural and urban poor and low income population, reconciling various interests is difficult, the agricultural basis is weak, and the tasks for reducing the rural-urban gaps and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still arduous.

The Report chooses to be ambiguous over the negative situation. For example, how big is the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or population in China, will they move into a state of “well-being” in the next 13 years, can rural questions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and can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incurred by the market reform be dealt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are left without solutions. The Report also points out further problems, including: excessive price paid by resource environment due to economic growth, labour security, income distribution,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duction safety, law and order, and among the party ranks, problems of formalism, bureaucratism, corruption, extravagance are still “relatively serious”. The Report pledges to actualize a general society of well-being by the

year 2020,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USD 2400, which would be 200% that of 2000, which was USD 800. It is dubious if such a pledge to bring a general uplifting of livelihood for the entire population will come true, especially when the panacea for such a development i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market economy.

In Guangdong, there has been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which now comprise two-thirds of all enterprises in the province. At the same time, state and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on the decline for nine years.ⁱ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Council State-owned Assets Monitoring Committee said that the shareholding reform of central enterprises will be accelerated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reducing the number from the current 155 to 80-100. Up to the end of 2006, these central enterprises had a total asset of 12.2 trillion yuan.ⁱⁱ

With their ascending economic might, capitalists would want more political power. A recent survey with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dicates that 28.8% feel that the most urgent work is to become a people’s deputy or a consultative committee member. Many young entrepreneurs also strive to become CCP members. Of the 10,773 new party members in 2006, 1,554 were entrepreneurs. At the 17th CCP Congress, the media noted 30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ew economic and new social organizations” representing RMB 10 trillion private assets. Most of them hold huge assets, some up to several billion yuan.ⁱⁱⁱ Critics have pointed out that over 20 red capitalists or former bosses now converted to high ranking officials have become members or alternate members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and not one representative of workers or peasants have made their way into the central power.^{iv} Statistically, the CCP has not revealed the percentage of such entrepreneur members. On the eve of the 17th Congres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CP membership was announced by the

CCP Organizational Division, that up to the end of June 2007, worker members numbered 7.96 million, and comprised 10.8% of the total membership, those from the agricultural, husbandry and fishery sectors were 31.5%, cadres, enterprise managers, 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ians were 29.1%, retired persons were 19.4%...^v Probably the entrepreneur members were included in the sector of enterprise managers, or under the category of 5% "others".

As for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the Report repeats the empty slogan of "firmly upholding socialist democracy", while subordinating this to "firmly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re is no change to the longstanding one-party dictatorship. However, there is more and more articulation of protest against the lack of democracy for the people. Mr Xie Tao, the former vice-president of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Yan Huang Chun Qiu, a magazine in China, in February 2007 to say that the political reform cannot be further procrastinated. Mr Wu Min, professor of the CCP Shanxi Province party School, wrote an article "There is no Communist Party without democracy", and asserted that the "central root of the illness" lies in the over-concentration of power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Hence, despite some younger personnel being brought into the Party leadership, there will not be any fundamental change to the basic political line of the CCP, and its bureaucratic way of rule.

There have been many reports of mass unrests and protests, resulting i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olice. Her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of such unrests in the months preceding the 17th Congress:

May 30: around 1,000 workers in Shenzhen went on strike, which spread and was joined by over 8,000 workers on June 2; this was the biggest strike in Shenzhen's history;

June 1: about 20,000 to 30,000 citizens of

Xiamen City took to the streets to protest the building of the PX chemical factory; 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cancel the project;

Early June: in Chongqing, an old flower hawker was beaten and seriously injured by the hawker control squads, causing a riot of several thousand people;

Early June: in Inner Mongolia, over 5,000 resident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on removal issues;

June 18: 20,000 people calshed with the police in Zhejiang on removal issues;

June 29: in Sichuan Province, over 3,000 workers went on strike to protest the corruption and incompetence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

July 18: in Jinzhou City of Liaoning Province, over 1,000 workers of the public transport company went on strike to protest privatization of the company, causing a total paralysis of the public transport;

July 30: over 13,000 taxis went on strike for 5 days;

August 21: about 10,000 workers went on strike in Shenzhen to protest doubling of workload and reduction to almost half of their wages;

August 24: about 2,000 villager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when they tried to prevent the building of a power plant;

September 27: in Shanwei of Guangdong Province, several thousand villagers who had been conducting their struggle for two years, clashed with the police in their attempt to prevent the building of a power plant.

Such incidents are many, and they are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masses in defense of their livelihood rights under the encroachment of so-called "development". The CCP cannot be expected to give up its power or its privileges. Hoping that it will reform itself is an illusion. It is up to the masses to resist the current injustices, and fight for their own better future.

ⁱ Wen Wei Po, 8 August 2007

ⁱⁱ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3 Nov 2007, and reported by Wen Wei Po, 4 Nov 2007. Apart from these 155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re are also about 5,00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pread under the control of over 80 Departments and State Council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Liu Jipeng, director of a research centre in Zhengfa University.

ⁱⁱⁱ Wen Wei Po, 15 October 2007

^{iv} See Willy Lam's article in Apple Daily, 25 Oct 2007

^v Wen Wei Po, 5 Oct 2007

十月評論 2007 年 第 2/3 期 2007 年 12 月 31 日
目 錄

香港	2 抗議人大常委會否決二零一二雙普選！權力歸於人民！.....	仲明
	4 施政報告拖延政改，劫貧濟富！.....	軍行
	5 區議會選舉評析.....	振言
	7 立法會補選的對決.....	微波
中國	9 中共十七大及其報告透視.....	張開
	12 民怨民憤 遍地浮現.....	張開
悼念	16 悼念劉平梅同志(1920－2007).....	十月評論社同人
	17 憶劉平梅.....	熊安東
國際	19 福田政權的修正路線走向.....	趙京
	20 俄國革命九十年仍在.....	大衛·曼德爾
	24 肯雅的人民議會.....	衛眾譯
	27 世界社會論壇的發展.....	休伯特
	29 查韋斯和委內瑞拉革命.....	石托敦
	31 查韋斯是托派份子？.....	里安·馬克·尤安
古巴 專頁	33 十字路口的古巴改革.....	揚·康拉德
	38 “思想鬥爭”和古巴的資本主義轉化.....	曼·帕·奧特加
	42 領導人的繼承是連貫性的標誌.....	吉恩·卡斯提羅
	47 切·格瓦拉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評論手記.....	米高·洛維
	49 越過菲德爾看古巴現實(訪談).....	薩繆爾·法博
歷史	53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下).....	彭述之遺作
回憶	58 曾猛其人(上).....	石隆
英譯	62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17 th Congress of the CCP.....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 34 ISSUES 2/3 2007.12.31

Hong Kong	2 Protest against the NPC's rejection of universal election in 2012.....	Zhong Ming
	4 The HK government's Policy Address robs the poor and delays political reform.....	Jun Xing
	5 On the election of District Board Members.....	Zhen Yan
	7 The contestation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election.....	Wei Bo
China	9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17 th Congress of the CCP.....	Zhang Kai
	12 Mass grievances and resistances spread all over China.....	Zhang Kai
Obituary	16 Memory for Comrade Liu Pingmei (1920-2007).....	October Review
	17 Remembering Liu Pingmei.....	Xiong Andong
International	19 Yasuo Fukuda's revisionist line.....	Zhao Jing
	20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inety years on.....	David Mandel
	24 Kenya: the People's Parliament – Interview with Wangai Mbatia.....	(tr) Wei Zhong
	2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Hubert
	29 Hugo Chavez and the revolution in Venezuela.....	Dave Stockton
	31 Chavez the Trotskyist?.....	Liam Mac Uaid
Cuban discussion	33 The Cuban revolution at the crossroads.....	Jan Conrad
	38 “The Battle of Ideas” and 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ban state.....	Manual Paz Ortega
	42 The Leadership Succession Bears the Mark of Continuity.....	Jean Castillo
	47 After a long wait... “Critical Notes” from Che.....	Michael Lowy
	49 Cuban reality beyond Fidel – Interview with Samuel Farber.....	(tr.) Wei Zhong
History	53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Communist Group in China (second part).....	Peng Shu Tsu
Memoirs	58 The person Zeng Meng (part 1).....	Shi Long
Article in English	62 A critique of the Report of the 17 th Congress of the CCP.....	Zhang Kai